



■民間人權陣線代表到立法會門外請願，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直指政府進行的是假諮詢。黃建通攝

必須反對23條立法 疫情肆虐 當局有責
港府不應大削綜援，向貧弱開刀！

反對美帝攻伊特輯 菲律賓反軍事全球化

巴西：人民的勝利 第三屆世界社會論壇

巴西工人黨與2002年全國大選

必須反對23 條立法

本刊評論員

在23條立法諮詢文件公佈了幾個月後，為要替強行立法製造有利條件，保安局便急急編製出23條立法意見匯編，發表後大受社會各界抨擊，指責它為達目的，不惜歪曲民意，錯誤百出，把人所共知的重要反對意見團體（如大律師公會、民主黨和宗教界團體等）都編入「未能辨定」的第3類中，陳日君等也指責沒有把他們的反對立場列入《匯編》內。(1)

保安局長為這些錯漏百出公開道歉，但說是無心之失與電腦出錯。民間人權陣線表示不予接受，認為她根本沒有認真考慮市民的意見；他們並公佈有26份被錯編為「未能辨定」的意見書，以及13份不被納入《匯編》的名單。(2)

這樣地製造民意的做法，反映出當局並沒有諮詢和尊重真正多數民意的誠意。也因此，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指責港府歪曲歷史、製造大多數市民支持立法的假象，壓制反對聲音。另一位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李志喜表示，許多支持立法的市民根本不了解立法內容，應將被歸入「支持」的意見看成「未能辨

定」，再將「未能辨定」的意見看成「反對」，才反映真正民意。

一意強行立法

保安局草擬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藍紙草案》於2月14日刊憲，12日後即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以圖全速在今年6月底以前通過，7月1日起施行。這些做法顯示堅決拒絕了真正大多數市民和民間團體反對立法的意見。而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立法，也必須先公佈有具體條文的白紙草案，充分諮詢港人意見，使能有足夠時間研究討論，並根據多數意見修改後，才提交香港全民公決；卻絕不應草率匆促地趕快由「保皇」勢力穩操多數票的立法會「蓋章」通過實行。但今天看來，當局已決心一意孤行，不會遵循我們指出的上述正當途徑去做了。這是必須加以嚴正指責和反對的。

上述的藍紙草案，儘管把一些罪行的範圍比諮詢文件的稍為收窄了，但仍拒絕了廣大市民和民間團體的批評意見，而保持了重要基本原則上損害市民自由權利的條文，其中很重要的問題包括有：

還政於民

請參加 下午3時

七一大遊行

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

遊行至 中環政府總部

民間人權陣線 主辦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0卷 第1期 (總第212期)

2003年5月31日出版

出版 / 編輯 / 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 3428 傳真：3494 1762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 3494 1762

E-mail Address：october_review@yahoo.com

Web Site：http://www.octreview.org/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損害市民各種自由的條文舉例

1. 雖然「管有煽動刊物罪」條文已刪去了，但卻保留了「處理煽動刊物罪」，包括印製、發行、輸出煽動性刊物，「有煽惑意圖」一詞的定義太廣，煽而不動也可以言入罪；當局拒絕將保障言論自由的《約翰內斯堡原則》納入草案，又拒絕寫入可用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的理由，這些都對言論、出版及新聞等自由造成重大威脅和損害。

2. 顛覆罪及分裂國家罪的有關係文並未能充分保障和平集會和提出主張等自由；諮詢文件3·7段曾承諾對這些自由權利會有「足夠及有效的保護」，但草案已沒有這些承諾了；港府高官曾一再堅稱，「嚴重犯罪手段」並不包括非法和平示威或集會等行為，但草案條文未有這樣的明確界定，以保障有關的自由權利。這就使當局將來可隨意入罪。香港市民如果支持大陸民運對中央的批評而舉行和平集會、遊行，而被中央政府定性為危害國家穩定的話，參加的香港市民就可能被控犯下顛覆罪了。而在「顛覆罪」中，僅僅被認定為「恐嚇」中央政府，便會構成犯罪。

3. 草案對叛國罪的條文，包括指「懷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形勢的意圖」。這所謂「意圖」，並非根據明確的損害行為，而只是憑控方推測作出的；「公敵」的定義包括「交戰的外來武裝部隊」，換言之，如果中央將來與台灣交戰，任何行動或協助台灣的行為都有可能成為叛國罪。條文對「協助」公敵的涵義不作明文解釋，也堅拒加入人道援助作為豁免或答辯理由，這將很不利於被告。

4. 草案對新聞界要求收窄《官方機密條例》以確保新聞自由，並沒加以理睬。草案反而包括，如果有關資料是洩露者從公務員等方面取得但不知道未經許可或以犯罪手法取得，便屬犯了洩露國家機密罪。這種限制資料發放的條文，在現時資訊發達的文明社會內，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假如是符合公眾知情權的利益，比如揭發政府的違法或非法行為，或者有關資料因已被廣泛流傳而再無秘密可言，實無理由控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否則也會對新聞、出版自由構成巨大威脅和損害。上引的李志喜大律師又指責：政府推出的小冊子誤導市民，例如在「竊取國家機密」罪中，小冊子說「金融資訊流通絕不會受阻」，但實際條文卻沒有這樣列明。(3)

閉門缺席審訊新機制

5. 草案擴大保安局長的權力，不經法庭便可取締被指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本地組織一經被取締，任何人如身為其幹事或成員、繼續管理該組織，參與該組織的集會或向該組織作出金錢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均屬犯罪。這就是說，被告可以是在沒有任何犯罪行為，而只是行使其結社、集會或對該組織施以援助的自由，就已經犯法，最終可被判刑3年。此外，草案條文並沒有詳列取締本地組織的罪證基礎。草案規定，終審法庭可在上訴人或其律師缺席的情況下進行聆訊。這將使被取締組織不能獲知取締理由的細節或證據，極難上訴，上訴機制等同虛設。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批評，把上訴機制決定權交予首席法官，是把司法機關政治化；(4)大律師公會則憂慮這會令法官淪為「政治工具」。前高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也認為，這種憂慮「不是無道理」。(5)

草案仍然保留了警察有權毋需法庭手令便可入屋搜查的條文。這對於市民的平常家居生活和私隱權是一大威脅，擔心隨時有警察（特別是在午夜或以後）破門入屋搜查。連楊鐵樑都直言「驚驚地」，「不是幾安樂」，其他一般市民的驚恐不安便可想而知了。

以上引述的草案條文表明，它對於香港市民長期所享有的言論、出版、新聞、示威、遊行、集會結社、人身保護等基本自由和權利，都構成重大的威脅和侵害。因此，這一藍紙條例草案是不能接受的；民間人權陣線等許多團體已經嚴正地要求港府把草案撤回。如果當局一意孤行，又得到立法會內保皇黨派的多數票通過，則廣大市民便需繼續反對到底，並爭取政制民主化，不把選舉新的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員的票投給這些保皇黨派候選人，而投給真誠地為市民爭取民主、民生權益的候選人。祇有終於爭取到政治民主化，才能制定出真正有利於絕大多數港人的法律，保障港人的民主、自由權利！

2003年3月10日

- 1 2月6日《明報》。
- 2 2月8日《明報》。
- 3 2月15日《明報》。
- 4 2月27日香港《經濟日報》。
- 5 2月30日《明報》。



港府無能差勁 沙士變本加厲

振言

香港政府雖然及時得知內地非典型肺炎的訊息，內地在今年1月已爆發「非典」，但起碼反應遲鈍，既不及時宣佈內地的和本港的疫情，又拖延宣佈本港的防疫措施，更著重於看內地當局的臉色行事，企圖盡量沖淡外國對香港疫情的恐懼心理，保持在港投資者的信心，而不是主要從香港市民的安全和利益角度出發去處理。

尚幸香港至今為止仍可繼續享有新聞自由，多得傳媒的努力報道才能及早獲知：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劉劍倫教授，帶了沙士疫病入住京華酒店，散播了病毒，導致2、3月間入住該酒店房間的人先後病發。3月4日，威爾斯醫院接收了這位源頭病人，因缺乏國內有關的重要資料及經驗，該病毒又前所未見，傳播力強而快速；使用氣管擴張器時，患者的飛沫四散，加上醫務人員的防毒裝備不足夠，病房擠迫，通風系統過時，結果導致大量醫務人員及病人受到感染。醫務人員處於最高危的環境，受感染的危險性極大，在當局沒有足夠保護的情況下，她（他）們仍不顧自己的一切，盡力照顧病者，不少人受到感染，飽受病毒的折磨，有些人甚至因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英勇犧牲的精神寫下了歷史上非常感人的一頁。

港府在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旅遊警告、馬來西亞禁止港人入境等等以後，才開始對出境旅客進行檢疫，但對於在羅湖等邊境入境旅客的檢疫，則久久仍不實行，而這本應是防備內地入境者可能帶入病毒的重要措施之一。港府對各醫院的醫護人員受感染、疫情向社區擴散、公佈有感染案的大廈名稱等事情上，都是在傳媒揭發、社會要求之後才被迫發放有關資料；既沒有及時封閉已出現大規模爆發疫症的威爾斯醫院，也沒有盡快對病者及其家人實施隔離，結果使病毒傳到社區，引發淘大花園數十住客受感染甚至死亡。它後來提出118億港元的紓困方案措施，還是在新加坡政府採取救市措施之後受到壓力才實行的，而且金額遠比數年前的救市撥款為低，很不足夠，儘管香港有巨額的財政盈餘。……像這樣的事例還可舉出

多些，可見董建華領導的無能、被動、差勁！

在疫情擴散後，香港的經濟大受打擊，各行各業，特別是飲食、旅遊、旅店、航空、的士等的生意都劇跌，工廠企業減產、停工、裁員、減薪，一些公司放無薪假……，老闆們都極力把損失轉嫁給職工僱員，使後者成為主要的受害者，「手停口停」，申請失業援助的人大增，不願申請的要自己設法解決。

嚴重地加劇了這種災難禍害的，應追溯至中央政府在中國爆發疫症初期的隱瞞實情、封鎖新聞等官僚手法，而香港特區政府則拖延、差勁。在拖延了半個多月後，董特首才公開宣佈：「香港正面對一場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厲的傳染病威脅。」但儘管如此，中央高官也不以為然，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在特首記者會作上述宣佈之後說，「香港有六百萬人，只有三百人因非典型肺炎入院，實在不算甚麼，主要是傳媒報道不夠中肯，才引起社會恐慌，並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交通樞紐的角色。」

這是京官又一次的具體表現，證明他們「一切只向錢看」，但求保住經濟發展，不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其他老百姓的健康安全和生命，都「實在不算甚麼」！甚麼真理、良心……，都給他們的利慾所「薰」掉了！



在這次「非典」戰役中，醫護人員所表現的專業和犧牲精神，值得全港市民借鏡。圖為首位因SARS殉職的醫護劉永佳的葬禮。

港府不應大削綜援，向貧弱開刀！

微波

香港特區政府多年來推行「劫貧濟富」政策，一再向社會上最窮苦的社群開刀，在削減綜援金額及津貼的問題上也表現得很清楚。

香港回歸後，當歌功頌德者宣稱回歸後「明天會更好」的時候，當局在1999年便一下子大減綜援基本金額兩成，以及一些生活津貼，申請人需要從基本金額內自行支付。今天，當局又完全拒絕多個社會服務、教育、宗教等團體和政黨的要求，宣布再大幅削減綜援基本金額和補助金11.1%，以及傷殘津貼金等。社福署長林鄭月娥同時宣稱，明年還有3%的「下調空間」；以後通縮持續，也同樣會再下調。所有長者、殘疾及長期病患的受助人都不能豁免，據稱，受到削減的受助人接近58萬。高官們知道，這幾類人士都是無力反對的，聽由別人宰割，都會承受。

此外，申領的條件也收緊。例如，居港1年後可申領的年限，要擴展到7年，在此長時間內，即使生活很困難也不能申領。而現時已有的限制也並不寬鬆，比如一名老婦訴苦說，她與兒子一家5口同住，單靠兒子很低微的經濟收入，但她仍無資格申領綜援。

由於香港社會日益向兩極分化，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貧窮戶日益增加，至01年底，戶數已增至385600，比96年的309500戶增加近25%，同期的人均收入則由1700元下降到1400元。這表明他們是更加需要多得到綜援，以維持合理的生活。現時當局反而要一再減少金額，顯然是另一新的倒行逆施。而當局又以申領人數逐年擴大，綜援支出不斷增加為另一理由，要野蠻無情地推行削減。而且，林鄭月娥還警告，可能採取「更激烈的措施」：綜援總開支封頂。這即是意味，儘管申領受助人以後年年增加，總開支也不增加，而只在所有受助者的基本金額內分擔。如果這樣，就揭破不只由於通縮的「理由」了！

為了向社會最貧窮的弱勢社群開刀，當局便出動它的宣傳機器，製造「社會輿論」，例如說，許多領綜援者都是懶人，比去工作收入更多；被認為領綜援可耻，使他們覺得在受人歧視、鄙視，包括其子女受

同學或其他人恥笑。由此造成更多的社會分化和歧視。

但實際上，部份市民被迫申領綜援金，基本上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他們或者由於失業而找不到再就業機會；或者因年老傷殘而已失去工作能力，或者被伴侶拋棄而又要撫養年幼兒女等等，卻又遇上本港社會福利保險等法制很不完善，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制，沒有失業及傷殘保險金，沒有最低工資制和工作機會以保障工人的收入，沒有完善的追討贍養費法律制度……，這使得有關人士不能不要靠綜援來維持自己及無依家人的生活。

當局之針對弱勢社群「埋手」開刀，也包括對短期合約的外傭，需每月徵收400元稅，幅度近11%，卻無薪俸稅一樣的寬免額和5%的起徵稅率。他（她）們每日工作一般比8小時制高近一倍，而原有月薪3760元，比其他的薪俸稅起徵點高很多；同時又被取消原來享有的較低廉醫療福利，要僱主為外傭買醫療保險費，等於變相地由外傭負擔醫療費，僱主並無得益。這就充滿種族歧視和欺壓弱勢社群的意味。難怪激起來自東南亞5國的12000外傭齊起反對，團結起來遊行請願。這種情勢，將大大影響香港在國際上的形象。

另一方面，當局又高喊節省開支，以此向下級公務員開刀，實行一刀切減薪6%。但高層的待遇優厚，減幾千元不會有甚麼影響，而且，當局仍繼續在「肥上」，例如，8名常任秘書長獲得跳級升職，等於跳級大加薪，單為此每年便多耗176萬元公帑；而有能力送子女到海外讀書的，一般都是高中級的公務員，港府02/03年的教育津貼勁增約1成，需撥款7億元應付。對於港府高官奇高的薪酬待遇，照理早應大幅削減，以節省巨額公帑的，但高官們反要背道而行。

如要削減財政赤字，港府必須徵收高收入的公司和個人的逐級累進稅，收入越多的，稅率應越高，以之回饋於香港社會，但港府一直拒絕向富人動手，充分顯示富人治港的「劫貧濟富」特性。

2003年2月27日

疫情強烈肆虐 當局負有咎責

軍行

非典型肺炎（SARS，譯稱沙士，內地簡稱「非典」）疫症首先在中國爆發。由於病毒為前所未見，毒性既非常劇烈，傳播力又快速兇猛，加上中國當局在最初幾個月內採取「諱疾忌醫」、極力封鎖消息、對外隱瞞疫情的駝鳥政策，以致疫情一發難以收拾，釀成近代歷史上罕見的災難，使人民大眾深受其害，許多人因染上而死亡，不少醫務工作者奮不顧身，捨己救人，以致不幸犧牲。

廣東省在去年11月已開始有這病例，在佛山等多個城市先後出現，卻一直沒有對外宣佈。12月27日，河源一名重病人被送進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醫治。國務院衛生部遲至今年1月下旬春節前，才派出一個級別甚低的工作組到廣東調查；春節過後，衛生部由副部長率領，相繼派出兩個專家組去調查；結果「毫無作為，未向人民發出任何警告」，也未在廣東省內採取任何隔離措施。當時的北京市長孟學農坦承北京在3月1日就出現病例。老軍醫蔣彥永寫信給《時代周刊》踢爆北京向公眾隱瞞真相，卻遭到壓力打擊。內地網站對留言只許對沙士作正面的討論。《人民日報》網站負責人承認，對社會產生壞影響的意見不能發表出來。內地傳媒工作者湧到廣東了解疫情，作出報道；有些印起的報紙被令收回。據說，中央電視台已做好廣東疫情專輯，但被禁止播出，網上文章也被阻發，編輯則遭譴責及撤換。

在疫情爆發之後，世界衛生組織曾要求到中國了解疫情，並願提供協助，都遭到中央及地方當局拒絕，而且謊稱當局已經控制疫情，實則仍在加速、加劇惡化。直至3月26日，在世衛組織的不斷施壓之下，中國官方才公佈已發生近8百個病例。

這是中國一貫的官僚專制、嚴厲控制傳媒、封鎖消息、「報喜不報憂」等特性的又一次表露。尤其是多年來「經濟掛帥」、唯利是圖、只求經濟發展速度、「穩定壓倒一切」的路線、政策，使上述的特性更變本加厲地推行；國家一向的建設投資方針偏向經濟，忽視醫療衛生，以致內地（特別是在農村）的醫

療系統發展長期滯後，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在全面推行市場經濟後，城鄉人民自己須負擔的醫療費用飛漲，導致看病和醫治十分困難，這在農村更加是如此。因此，在這次疫症爆發後便造成了危機。

當局初期對非典的處理手法實際上是非常有害的做法，立即招致的惡果是官方及民間都不加警惕、預防和及時醫治，導致疫情更加難以控制，迅速擴散到香港和全國各地，以至世界各國，而對中國（包括香港）的經濟則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損失一時難以估計。這不能不是中國官方上述錯誤所嚴重加劇的。

受到疫情的打擊，國內城市的許多行業生意大減；不少工業生產甚至停產，工人更加大量地失業，擴展了失業大軍的行列；城市的貧困戶也隨之大增，低下階層最蒙此災害。

原來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以及進城買賣的農民，也無可避免地備受其壞影響。他們與城市低下層人士差不多都缺少財力去買口罩等必需裝備。他們返回農村，又可能把病毒帶回去；更由於農村公共衛生體系薄弱，農民對預防疫病意識低，疫情容易在農村擴散；即使未有擴散的，對農村的鄉鎮企業生產、農民生活等方面也會產生連鎖效應，物價會上升，部份生活用品短缺，農民外出務工受阻，農產品到城市銷售比前更困難等等。

城鄉人民在遭受這些損失、精神上又增加了疫症的威脅時，難免會進一步增加對當局和幹部處理疫情不當等的不滿，上街示威，以至集體衝擊政府機關，加劇社會的矛盾和衝突。這許多的後果，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都不能辭其咎責！



政府報告啟示的當前嚴重問題

張開

人大依舊是「橡皮圖章」

第10屆全國人大第1次會議，循例地串演它的「橡皮圖章」、「表決機器」的角色，這些角色稱號，在內地不少報刊和學者評論中都可見到，有的還加上「政府傳聲筒」、「附言人」等等。這些都是名符其實的。召開它的作用僅在奉命通過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國家主要領導人名單，和卸任總理等的工作報告，儘管在會前有些國內學者在報刊上希望人大代表們要「硬起來」，改變上述的角色和形象。

在全部照收的這份名單中，江澤民續任國家軍委會主席已正式確定。這是向國內外明白宣告，江所提出的新老交替、「幹部年輕化」，自己並沒有以身作則，而依然繼續擁有實權，由台前退居幕後指揮，重演鄧小平當年以普通黨員身份「垂簾聽政」的故技。但在投票通過他時，雖然得到中共不斷製造捧場輿論，和強調以「穩定」為理由，其得票率卻為92%，有反對票98張，棄權票122張。這反映出仍有不少「代表」認為江應該全面交班。這與胡錦濤任國家主席的得票率達99%（只有4票反對、3票棄權），形成較明顯對照，雖然後者有名無實，而江則是有實無名的。

各個工作報告雖然是盡量誇大成就、沖淡缺點錯誤、多報喜少報憂的，但仍可以從中看出5年來一些情況的部份重要數據和資料（姑且假定官方所提供的這些數據及資料可作參考）。以下就是筆者認為需要從中引用和評述的問題。

財赤大增 潛在財政危機

朱鎔基的《政府工作報告》佔了報章3大版，幾乎各方面都有涉及，列出了許多數字，去證明他執掌國務院總理5年內的巨大成就和政績，並提出了今後工作方針政策「建議」。

的確，中國近5年來的經濟發展和建設，無疑是比以前快速而巨大的。舉例來看，朱鎔基報告，在5

年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17.2萬億元（但沒有說明其中的國有資產和非國有資產投資分別所佔的百分比），全國水利建設投資3562億元，公路建設投資12343億元，西部大開發中新開的建設重點工程投資總規模6000多億元，全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投入5800億元，等等。

這麼巨大的支出，主要是靠增加捐稅等財政收入，加強對「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徵取，擴大財政赤字和發行國債，後者使朱鎔基得到了「赤字總理」的稱號，在他任期5年內，財政赤字年年大增，從98年460億元，增加到03年預算3198億元，增幅近6倍（這還是扣除了去年發行國債5680億元，和03年預測發行1400億元的）。

<1>

這項財赤實際上靠增發貨幣來支付，即靠一般所稱的通貨膨脹，造成貨幣貶值，勞動人民的實際工資降低。

財赤連續兩年都突破3000億元，連出席會議的一些政協委員（如經濟學家吳敬璉等）也提出要警惕和化解財赤的風險，這可能造成潛在危險（即財政危機）。雖然朱鎔基們辯解說，國家負債率沒有超過GDP3%的警戒線，但實際上卻有隱性債務，比如銀行的不良資產、國企老職工的個人勞保賬戶的隱形負債等，亦即是已超過國際上的「警戒線」的。

國企改革使其比重及作用大降

朱報告指出，國企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要堅持推進國企改革，實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簡稱「國資委」），建立中央、地方兩級管理體制，地方的國資將歸地方管。一份港報的特稿報道：這將在全國掀起新一輪的由地方官員負責出售國企的浪潮；而「管理層控股」（Management Buyout，簡稱MBO）被認為是國資退出的有效途徑，即公司的大部份股份出售給管理層。北京不少經濟學者認為，這是國資流失的一

種途徑。有經濟學者甚至形容：「MBO是最後一次瓜分國資最後一桶金的機會。」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也警告，如果出資人機構的權力掌握不當或缺乏監督，比如出現爭先將國資「一賣了之」，或對經營者半賣半送等情況，很快就會把可能用於解決或部份解決對職工不良債務的資源耗盡，那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2>}

在嚴重貪污和官僚浪費之下，國有資產多年來迅速流失，國家則每年以大量固定資產投資補入。據財政部去年公布，截至2001年底，國有資產總規模為11萬億元。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同期中國民眾擁有的金融資產已超過12萬億元。國統局副局長邱曉華在回顧02年中國經濟發展情況時說，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3分之1來自國有經濟，3分之2來自非國有經濟，其中個體民營經濟已同外資經濟、股份制經濟一起，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3大非公有經濟力量之一。^{<3>}這是中共全面推行市場經濟、促使中國資本主義化的結果，表明中共所稱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佔比重及其作用已日益被資本主義經濟及其作用所超越、取代。

市場經濟全面推行的惡果之一，是社會矛盾更尖銳化，治安日益惡化，國家的鎮壓機器加強。這些表現在蕭揚的報告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向人大報告：高院過去5年審結各類案件2萬餘件，較前5年大幅上升了46%，各地方法院審結的案件有近3千萬件，也上升了22%。各種罪案數字大幅增加，其中涉及顛覆國家、分裂國家等犯罪；經濟犯罪的案件增幅驚人，比5年前上升了68%，判罪近萬人，上升了130%。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數字也大增，有8萬3千多人被判罪，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662人，比5年前上升了65%。^{<4>}

下崗失業情勢「非常嚴重」

朱報告指出：98年以來，國企下崗職工2700多萬人，有90%以上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先後有1800多萬人再就業。（即仍有900萬人以上未再就業。）

不過，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7日後在記

者會上，雖也舉出朱的上述兩個數字，卻宣稱到02年年底，中國有失業人員770萬人，下崗職工410萬人。^{<5>}而他在去年12月中共16大記者會上，則宣布到02年9月底為止，登記失業人口752萬人，國企下崗職工有600多萬人（兩者合計1352萬人），即是說，3個月後減少了172萬人。這與朱的上引數字，和他本人之同時宣稱「失業問題越來越嚴峻」並不一致。

中國官方一直堅稱，城鎮失業率至去年底仍只為4%，企圖以此片面數字減低失業的嚴重性，但實際情況卻越來越嚴重，致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也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表報告時指出：「綜合各方面的研究結果，目前全國的城鎮失業率已經約達8%至10%，而且適齡勞動人口正以每年新增1000萬人增長。」^{<6>}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承認城鎮失業率大大超過在這之前的官方數字，承認要把下崗職工和其他類型的失業也包括在內。

正因為像張左己所坦承的「當前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中國對企業裁員要作出新的規範：裁員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通過；如果裁員方案和社會保障辦法不明確、資金不到位，就不能進入裁員程序；國有大中型企業一次性裁員比較多的，要報當地政府批准。^{<7>}

但這些規範即使能夠全部做到，也不能有效解決當前「非常嚴峻」的失業問題。何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地方各企業的負責人也會陽奉陰違，致使有關規範難以落實。

由於情況的日益嚴重，激發出各地工人（尤其是下崗失業工人）的更多鬥爭行動。祇在兩會期間，在失業嚴重的東北，就據報有佳木斯市逾5百名紡織工人連續上街，要求提高失業補助金（現時每月只得120元，且不按時發給），造紙和製糖業工人也加入行列。^{<8>}而在較早前，西安市數百名軍工廠工人抗議廠方遣散，到公路靜坐；長春市4百多名酒廠工人抗議廠方不供應暖氣；遼陽市逾千鐵合金廠和紡織廠工人抗議欠薪，等等。^{<9>}此外，在人大會議期間，一名失業5年的黑龍江工人方慶輝則以個人抗議方式，闖入北京路透社辦事處挾持職員，聲稱要伸張正義，揭露中國的黑暗和腐敗。這些都是中國社會危機激化的反映。

「三農」問題的癥結和惡化

中共在以前一段長期間對「三農」的政策措施，都是盡量多取少予，以犧牲農民實際利益來進行經濟投資等，偏重工業而輕視農業，因此，加大了工、農業之間的畸重畸輕情況，制約了農業和農村合理發展，尤其是長期來的苛捐雜稅、繁多攤派等沉重負擔，壓得農民苦不堪言，生活無法改善。在人民公社解散後，三農問題才有較好的改進，農業生產有了起色。多年前的農村改革，也使農民得到實惠。但從1997年起，收入便連年下降。朱的報告承認現時「農產品供過於求，價格下降」，是收入下降的原因。他和其他的官方說法，只是「收入增長緩慢」，以此來掩飾問題的嚴重性。但他的報告不得不提出要堅持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突出位置，把加強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儘管朱如此提出，但在實際上，國家對「三農」的經濟上支持卻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一貫的重工輕農路線，這可以從朱的報告仍在誇讚一些有關數字上反映出。他說，5年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17.2萬億元（他沒有指出其中有無與農業有關的固定資產或其百分比），完成工業技術改造投資2.66萬億元，而國家財政支持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只是4千多億元。在中共去年更加強調要支援協助解決「三農」困難之後，財政部長項懷誠向大會報告，2002年支援農村生產、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林水氣等部門事業費達1088億元（佔財政支出22012億元的4.94%），03年的有關財政預算是305億（佔財政支出的1.28%）。^{〔10〕}由此又可見所佔比例和支援力度之低，遠不夠紓解困難的需要；而由於中國大作讓步加入世貿後，外國廉美農產品大量進入中國市場，「三農」的困難將會大增。

朱的報告如此重視要著重解決「三農」問題，重要原因之一是它要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北京大學教授吳樹青指出，這比增加投資需求更重要；而增加農民收入和擴大就業，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問題尤具關鍵性。但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純收入劇減，結果是9億農民無錢消費。^{〔11〕}

今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12〕}9億農民佔了

全國人口的7成左右。這麼大比例的人口收入劇減，家庭經濟怎能寬裕而安然地過著小康生活？但江澤民在去年12月的中共16大報告中卻宣稱：「中國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水平」。即使照計委主任曾炎培闡釋，中國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小康，在2000年人均GDP為800美元（折合人民幣約6680元）。而官方宣布城市居民收入為6860元，農民收入為2366元，企圖以此呼應江的總體小康誇大說話。但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指出：農民收入中的40%為實物收入，現金收入1800元，其中部分用於購買農藥化肥等，真正可用於消費的只有1500元：「農民沒有真正成為市場主體，農民自己對生產要素、生產成果沒有支配權。」^{〔13〕}

在這次全國政協會議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陳明德說，目前全國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均收入僅在2000元以下，貧富差距已超出國際認可的警戒線。^{〔14〕}

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更具體地舉出：中國農村迄今有近3千萬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6千萬人口仍徘徊在溫飽線上（即，高近1億人存在吃的問題）。其中人均（年）收入在500元人民幣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有1459萬人；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有9033萬人；人均（年）收入1000至2000元的人口有31079萬人。^{〔15〕}者加起來便有41571萬人，約佔農業人口近一半左右。

多年來中共已提出要減輕農民的沉重負擔，明令取消了許多苛捐雜稅項目，並推行費改稅。但實際上，上級雖然三令五申，各地方下級幹部卻陽奉陰違，或另立名目來代替，使得廣大農民總的實際得益很少，收入難以增加，即使近年來中央高層講話或下達文件重申減輕農民負擔，卻收效不大。直至幾個月前，官方的評論也有所揭露。例如，新華網在1月21日發表新華社記者署名文章，指目前全國已有20個省份試行費稅改革，直接增項加碼、硬性攤派的情況已經減少，但「個別」地方卻轉移加重農民負擔，一些部門變換手法，現在農村常見收費有二、三十項，都有法規依據。^{〔16〕}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李建興的時評指稱，記者最近在採訪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出現了轉移加重農民負擔的新情況：亂

收費由農業稅費向行業收費轉移。「一些部門」變換手法向農民要錢，有些地方在孩子身上亂收費，一些地方基層政府搞「有償服務，把行政行為變成經濟行為。」記者們可能爲了通過刊登這一關，往往要加上「一些」等形容詞，但行文間卻露出是比較普遍的。

必需政治民主改革

由此又一次顯示，中共長期來承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習慣，今天在各地仍舊通行。這是由於整個官僚政治制度，使得各部門、各級政府和幹部能夠繼續享有其特權、維護其既得利益。

河北省一名農牧業集團董事長孫大午指出：農民想合法出售熟雞蛋要辦40多項手續；各個利益部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農村的發展。農民收入難以增加，癥結在於國家利益部門化，農村權力機構過於龐大。^{<17>}

農民在經濟上承受苛捐雜稅等沉重負擔，政治上又受到「城鄉有別」政策的歧視和壓迫，從而形成了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在農村的主要社會矛盾，其中部分人在忍無可忍之時，便爆發出反抗的行動。由於消息多被封鎖，外間難以常常獲悉，但有時也會漏網傳出。例如，上引的《明報》在刊登新華網指農村雜稅繁重的同時，便報道了新發生的農民武力抗稅和民工追討欠薪的事件：一宗是6日前在河北故城縣青罕鎮南王庄，2千村民抗拒繳交農業稅，與鎮政府下鄉追稅的30多人徵稅團衝突，推翻了8部汽車，打傷10名徵稅人員，趕走了他們；3日後有6名村民被帶走，而村民則扣留了鎮黨委書記等人，作爲人質；十分憤怒的2千村民聲稱不放人就要衝擊鎮政府，結果迫得縣政府讓步；另一宗是1日前發生在南京，逾300名來自農村的民工向地盤老闆追討拖欠的工資，集體走上街頭示威，這是全國各地民工普遍被拖欠工資紛紛起而鬥爭的無數事例之一。

農民的日增不滿和抗爭，也是迫使中共聲言要把解決「三農」難題作爲經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另一重要原因。

但要有效地發展農業及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就必須進行民主政治改革，廢除各級官僚幹部的政治經濟特權，把他們從騎在人民頭上拉下來。朱的報告雖然提出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議中循例有「發展社

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且要「加強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但十分諷刺的，正是在這報告作出之前兩天，在兩會進行中的3月3日，《21世紀環球報》就被指犯了5宗罪而勒令停刊，其中一罪是發表毛澤東秘書李銳的專訪，引述他表示中國最大的危險在於「黨政不分，黨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他建議政治改革要從黨內民主化開始，在中共17大時，政治局委員、常委、總書記都應在黨代會上競選產生。他又批評毛澤東思想如同邪教，批評鄧小平拒絕政改。^{<18>}

同一時候，隸屬中國新聞社的《新聞周刊》兩名編輯，近日就因刊登回顧朱鎔基任總理的政績而遭解僱。該周刊也被中宣部整頓。^{<19>}

這兩宗壓制新聞言論自由的事例，不過是同類事例中當時最新發生的。它們再次證明朱的上述宣稱完全是與官方的實際行動相反的假大空話。

2003年4月6日

注釋：

- 1 3月7日《蘋果日報》。
- 2 3月29日《香港經濟日報》。
- 3 2月22日《明報》。
- 4 3月11日《星島日報》。
- 5 3月13日《文匯報》北京電。
- 6 3月26日《香港經濟日報》。
- 7 3月13日《文匯報》北京電。
- 8 3月13日《香港經濟日報》。
- 9 3月13日《蘋果日報》。
- 10 3月7日《人民日報》。
- 11 3月13日《信報》。
- 12 1月9日《人民日報》載北京1月8日訊。
- 13 02年7月15日《信報》。
- 14 3月13日《蘋果日報》轉載廣州《新快報》報道。
- 15 3月28日《明報》。
- 16 1月22日《明報》。
- 17 4月5日《蘋果日報》轉載《中國經濟時報》報道。
- 18 3月15日《星島日報》。
- 19 3月15日《蘋果日報》。

強烈反對美軍攻佔伊拉克

社論

美英帝國主義聯軍在不斷軍事威脅和瘋狂轟炸之後，終於在3月20日最後通牒期滿時揮軍進侵伊拉克。儘管是以大石壓卵的態勢進攻，卻遭到伊拉克軍民的頑強抵制。雖然由於雙方軍力太過懸殊，美軍不需很久便可攻陷巴格達，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卻顯現出是最赤裸裸的侵略，是爲了控制這個世界最豐富石油儲藏國家之一的資源，把伊拉克變成爲美帝的變相殖民地，使美帝在這個地區建立霸權。對於這種恃強凌弱、以大壓小的侵佔一個獨立主權國的強盜行徑，必須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和反對。

布殊出兵的最大藉口是說，伊拉克藏有大殺傷力武器，威脅世界和平。但美國卻提不出確實證據，而它自己才是擁有最多殺傷力武器的國家；聯合國武器調查團雖經過縝密調查也仍然未能有所發現，美國就不等待調查團繼續完成任務，便急忙進攻了！

布殊的另一藉口是說，伊拉克薩達姆支持世界恐怖組織，對9·11襲擊美國須負責任，但也提不出證據，自行表明他完全是捏造藉口，賊喊捉賊。

布殊在攻佔伊拉克之後，以後的打擊對象很可能是伊朗，甚至敘利亞等國。

美帝這種侵略行徑，在它揚言要進攻之前，已經連續遭到世界許多國家和美國的人民反對，有的群眾示威遊行一天合計就超過一千萬人，寫下了群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弱小國家的鬥爭史上非常罕見的一頁，顯示出美英帝國主義侵略的普遍不得人心、謊言被識穿！但布殊仍然違抗反戰的主流民意，一意孤行，成爲破壞和平的戰爭罪犯，必將受到歷史的審判和懲罰。

英國和西班牙等少數國家的執政者，爲了希圖從美國得到一點好處，竟不惜充當美帝侵略幫兇，把自己綁在攻伊的戰車上。

今天的聯合國，即使表面上似乎沒有繼續像列寧當年所批評那樣成爲「帝國主義強盜們分贓的機關」，其中許多的成員國家（例如德、法、俄、中等

國）都表示反對美國未經過聯合國授權而攻伊，但這些表態只是官樣的形式上交待，實際上不能起到阻止的作用。這些國家的政府，爲了不想過份得罪美國，損傷雙方的關係，特別是希望戰後繼續在伊分得某種好處，因此，反對的表態更加顯得空洞無力。

中國政府對反對美軍攻伊的表態，比德、法、俄溫和得多，主要原因是爲了「一切向錢看」的發展中國經濟，要「與美方共同努力，把中美關係的積極勢頭保持和發展下去」（胡錦濤語）。

伊拉克人民在西方國家實行了十多年的嚴厲經濟封鎖和海灣戰爭之後，已經飽嚐了痛苦折磨；在薩達姆倒台以後，又面臨美帝等國的經濟資源掠奪和政治壓迫，他們既要反對外國的掠奪者和壓迫者，又要面對新成立的本國傀儡政權，和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據勢力。

他們必需進行政治鬥爭，以總罷工、罷課、上街集會、遊行示威，甚至游擊戰術等一切能夠運用的方法，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佔領和掠奪。在強大敵人的統治下，一些激進組織及其成員可能採取個人自殺式的恐怖主義行動，以爆炸來與目標敵人同歸於盡；但這種做法，卻會使一些無辜的人民（包括外國的和本國的人民）遭受傷亡，而對美帝及其軍力的打擊卻起不到甚麼有效作用。而且，這些恐怖主義行動反而給帝國主義者以藉口，利用來欺騙部份人民，特別是美國人，以加深他們對9·11恐怖襲擊的偏見，增強他們的狹隘愛國主義情緒，並有利於布殊明年的總統競選連任，從而繼續推行他維護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極右傾政策。

如要徹底而最有效地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反動的軍事擴張掠奪政策，就需要美國勞動人民能夠團結行動起來，用革命推翻大壟斷財團的經濟、政治統治的根基——現存的資本帝國主義社會制度；而這也需要國際勞動人民的支援幫助才能勝利完成的！

布殊、切尼、拉姆斯菲爾德三重奏

——新帝國與戰爭——

羅莫、米勒

美國已經發動了對伊拉克戰爭，事實上使我們的國家走上了不斷戰爭的道路。

真正的“邪惡軸心”在華盛頓，華盛頓的主人們，正準備對任一國家實行長期對抗，只要這一國家有可能發展為某一地區的大國地位的話。

僅在一年半前，這三駕馬車（布殊、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迫使我們走上了與中國對抗之路。各種軍艦部署在台灣海峽，加強了反華宣傳，軍事雜誌上刊出種種論文，紛紛提出不同的反華方案，而我們的偵察機便摔在中國的領土上。這些出事的英雄們還不是紐約市的警察和救火隊員，而是飛行員和軍事情報人員，他們在中國官方辦公大樓裏度過了所謂“艱難的時刻”——那裏有空調設備，他們用筷子進食，吃的是中國餐。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在追捕基地組織問題上真的團結起來了。從那以後，我們開始攻打阿富汗，我們的部隊駐紮在伊朗和阿富汗周圍的前蘇聯共和國領土上。這是第一次我們在產油的廣大地區駐紮

軍隊，並與該地區的國家簽署了條約。

解決了伊拉克之後，美軍並沒有回到國內，而是準備發動另一次冒險行為：伊朗終於被提到布殊進攻的名單上，或者冒險行為是針對中國的，或者針對北朝鮮的。

所有主戰的鷹派人物，在麥斯布特寫的新書《和平的野蠻戰爭》中發出了傻笑，竊竊私語，這本新書回顧了我們在北非海岸到越南所發動的光榮小戰役。實際上，那就是越南戰爭。布特在書的最後一節中呼籲要發動更多的小戰役，他說，提到我們領導人面前的，正是要有勇氣，要樂於“為劊子手付清戰款”。

毫無疑問，而且歷來如此，我們的另一批母親們的兒女要為此付出鮮血的代價了。

如同以往一樣，我們必須作長期戰鬥準備，只要有可能，我們就要說出去，提出不同的觀點。

（黃申摘譯自《退伍軍人》2003年春季號）

21世紀的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

瑟法蒂

21世紀初，軍國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之間有了全新關係。這種“無界限戰爭”，即布殊政府所採納的新政治方案，標誌著美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重大變化，與以往不同的是，資本全球化和軍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統治相互關連的兩個方面。

羅莎·盧森堡的名言說：“在資本發展上，軍國主義有其特殊的作用，它伴隨著資本和積累的每一歷

史階段”。她說：“帝國主義的積累階段”描述為“全球資本積累的競爭階段”。暴力、欺詐、掠奪毫不掩飾地公開表現出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名言指出：“歷史表明，戰爭行為取決於武器生產，而武器的生產則取決於經濟情況，特別取決於工業和技術的發展”。對恩格斯來說，資本—帝國主義時期的“軍國主義統治了歐

洲，並正在吞沒了歐洲。”1914年爆發的歐洲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已經證實了恩格斯的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武器生產已成為技術發展的核心（如宇航業、電子業、核生產工業等）。在最近50年中，美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費開支，均已達到空前高水平，據說這是為了對付蘇聯的威脅，而在蘇聯國內，巨額軍費開支是為了鞏固蘇聯統治層及其寄生性生存的利益，為了有利於他們吮吸生產和財政的資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工業系統已選擇紮根在美國經濟和社會中，這並不因蘇聯解體有所削弱，相反地卻進入了一個新的鞏固階段。軍事工業系統的不斷加強，是取決於下列相關因素：工業的集中化，武器製造公司和財政資本的緊密相聯，克林頓政府和布殊政府軍費預算不斷地增加，這些因素都在當今資訊統治“和以網絡為中心的軍事行為”中起著決定性作用。

軍事上的至高無上權，使美國的武器製造公司在ICT（訊息—電訊技術）發展中取得了中心位置。武器製造公司必須為當地部隊開發新的武器系統，也就是五角大樓專家們提出的為“城市戰”作準備，把士兵們用超高精尖武器裝備起來，目的在於發動戰爭用以反對人口密集的南方諸國以及北方城市的所謂“危險階級”。武器製造公司集團力圖把壯大“國家安全體制”與非軍事目標結合起來，這就關係到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了。軍事安全體制在未來幾年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軍事工業聯合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

21世紀的帝國主義

按照哈德特（Hardt）和內格里（Negri）兩位學者的看法，資本統治的“國家形式”遠沒有消失，而現在則讓位給“資本帝國”了，在這種帝國內部，資本與勞動相互對抗，而無法調解。資本為了保護統治，離開了政治機構（包括法院、軍事委員會）就一事無成。就這一意義來說，上述兩位學者提到的“世界資本主義”並不存在。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必然有超越國家界限和與其他障礙的趨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市場就包含在資本這一概念內”，但在發展進程中，充滿著各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分子之間的矛盾。

21世紀帝國主義的特點是：美國控制了其他帝

國主義國家，因此在20世紀期間爆發過那種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就不會在21世紀內再爆發了。美國和歐盟統治階級，在一定程度上如馬克思所說的，他們的相互關係就是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但“他們之間的競爭絲毫不會失去相互關照”，他們在面對整個工人階級，面對受他們統治的國家民族，便會組成真正的“共濟會”而相互共濟。

資本全球化與軍國主義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便已確定地指出，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列強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這一事實，並不能排除掉戰爭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關係。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共控制下的中國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造，一旦在經濟領域內威脅到美國，那將會有甚麼情況發生呢？這裏，考茨基所說的，超帝國主義能使資本克服其矛盾，已無濟於事了。在資本全球化的現階段，戰爭將保留著並擴大著它的作用。

資本全球化並不表明全球規模的價值再生產的擴大化，而只能導致掠奪性的加強。資本的產權，集中了財政收入，而盜走了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不是生產得越多，而恰好相反，根本無法滿足廣大群眾的需要。

資本全球化的矛盾在於：一方面自身已發展到空前無法比擬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摧毀了大多數非洲國家，並把新興的亞洲和拉美國家拋向危機。在這個進程中，美國都起著主要作用。

21世紀的今天，國家暴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就拆穿了要把“市場”和自由貿易跟和平和民主結合起來的神話。

伴隨資本全球化而來的是商品化，商品化容許市場的存在具有優先性，這就加重了生產者的依賴性，並使新興社會集團受到了奴役，特別是在被統治的國家裏。商品化和市場優先性還容許他們有污染權，壟斷了生活必需品製造權和知識產權。這便威脅到人類自由。所有這一切，離開了暴力使用便無法達到目的。

美國是資本全球化的中心。資本全球化與軍國主義是同一有機現象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的相互依賴性在美國表現得更加突出。如果說美國是資本全球化的中心，她同時也是一切矛盾的中心。這些矛盾的快速發展，恰好拆穿了那些人的謊言，他們認為美國在全球衰退的海洋裏建立起一個“繁榮的島國”。

九，一一事件之後，經濟矛盾並沒有減縮，而是擴大，人們因此使用了“階級戰”這一措詞。

布殊政府要策動的“無界限的戰爭”，是同最近20年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枯榮興衰有關。這一政策反映了財政寡頭們的利益，他們的性質基礎是依賴對自然資源的掠奪（特別是石油），以及無限止地對債務的償還，即使這樣做會危及並威脅到最弱勢的各社會階級和民族，也是在所不顧的。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其

他佔統治地位的強國，通過直接管理、委任管理或保護國的形式，實現她們的野心，即刺激被統治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種統治方式毫不遜於20世紀初帝國主義的殖民征服。最悲慘的實例是非洲大陸，最近20年來，提上日程的是肢解南非各國，因為他們無能阻止帝國主義統治的惡果。

（黃申節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3月號）

給戰爭火上添油

尤德里

現時，觀察家們的問題是：以美國為首的反伊拉克戰爭“何時”開始？而不是過去所問的“如果”戰爭開始了……。但反伊戰爭是否早已經開始了呢？

僅在2002年8月，美英轟炸機“出擊10次”，在伊拉克領土上轟炸伊軍指揮中心。在公眾爭論的陰影下，美國正在伊拉克周邊地區部署軍隊，其速度節奏之快，遠遠超過1990-91年“沙漠風暴”戰役的準備階段。美軍駐紮的地區還有：中東、中亞、非洲的合恩角，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哈薩克斯坦、卡塔爾、巴林、阿曼、也門、埃里特里亞和肯尼亞。此外還要加上美國軍艦駐紮在波斯灣、阿曼海、紅海和地中海。在所有這些地區和國家中，以色列起著頭等重要的作用。

用不著大家大驚小怪的是，美國軍事專家強調指出，發動對伊戰爭的後勤工作，在數量上要超過1990-91年的“沙漠風暴”戰役。

權力壟斷

反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帝國主義對反伊戰爭已作出了新的部署。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一政策的大綱草案已經制訂出來。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紐約時報透露說，大綱起草者就是現任布殊政府中最有影響勢力的人物和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人。大綱的主要內容就是為五角大樓提出了“防禦計

劃指南”。指南詳細說明了美國在後冷戰期的外交、軍事政策。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這一政策斷言，美國的使命在於確保世界任何地區不得有敵對的超級大國出現。美國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說服其他先進工業國家深信美國定將保護她們的合法權益，保持她們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大綱進一步說明，美國必須保持現有機制，力圖阻止潛在的競爭大國發揮它的地區性的、甚至全球性的重要作用。大綱指出，俄羅斯和中國具有潛在威脅性，並警告說，德國、日本以及其他工業大國，只要她們的安全受到威脅，定會重新武裝起來，要求得到核武器，這便會同美國進行競爭了。

這一方針與賴斯、拉姆斯菲爾德、切尼的聲明有驚人的相似。2002年9月20日紐約時報又透露一個文件，名為《威脅與回應》。

紐約時報評論這一文件時說：“布殊的原則，在國家安全措施方面，比之自列根時期以來任何措施更為有力，更具進攻性，這原則包括削弱核不擴散條約，採用牽制和威脅戰略，認為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美國主要政策幾乎都已失效了，認為對美國的威脅與其說來自那些勝利了的國家，倒不如說來自那些失敗了的國家。”文件中最突出的因素在於布殊堅持在蘇聯解體之後，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能追上美國已經取得的領先地位。當俄羅斯陷入深刻的財政困境時，布殊的原則便是針對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因為這些大國正在增強她們的常規軍事力量。

所有這種論述是同2002年1月出版的《核形勢評論》雜誌所提出的，以及賴斯和拉姆斯菲爾德所發表的論說，是完全符合的。英國日報總結說：“總之，賴斯女士和布殊先生認定，他們能支配其他國家，並與這些國家結成同盟。美國軍事優勢能阻止其他國家追求他們自己的軍事規劃，並鼓勵他們在其他領域的合作。”

按照美帝國主義這一總方針，我們定必走近反伊拉克戰爭。由這一戰爭所激發起來的一國或一地區的不平衡和政治不穩，卻將與這個總戰略一體化。這個一體化定將提供機會重新形成有利於美國，以及它的享有特權的盟國的力量關係，確保控制某些國家及其資源，通過政權的改變，建立新的同盟，削弱他們現有的及潛在的敵手地位。

二十一世紀的能源市場

美國的優先性是同其軍事實力相一致的，因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向著有利於美國而重新調整。美國是歷史上空前的世界大國，也是最大的債主國。歐洲、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的金融轉移，使美國財政赤字得到了緩解。

如果說美國依賴國際金融流入到華爾街，它也同樣依賴能源所需的石油進口。2001年5月提出的全國能源政策報告——即眾所周知的切尼報告——顯示了兩大優先權：（1）在長期內增加並確保對波斯灣地區的油源開發；（2）使油源供應多渠道化。

伊拉克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蘊藏國：計有1120億桶。二十多年來，地質研究已經中斷了，73口油井中，僅有24口還在營作。有人估計，伊拉克石油蘊藏量可高達2500億桶，而且石油質量高，提煉成本低，交通方便。換言之，如果誰掌握了伊拉克的石油資源，誰就享有21世紀能源市場的決定性影響力。

伊拉克石油是處於多種策略較量的中心。2001年6月，聯合國辯論“以靈活方式制裁”伊拉克時，法國提出的議案，允許外國資本投資伊拉克油田，卻遭到了美、英的阻撓。儘管有這些障礙，多個石油公司已同伊拉克政府簽訂了合同，他們獲得了直接勘探和提煉權，這就突破了伊拉克國家公司的傳統政策。

然而，所有上述這些計劃，都有可能失敗，因為美國感興趣的是“改變伊拉克政權”，因此，美國、

歐洲、俄羅斯以及中國的某些公司關於開發伊拉克油田的合同，在“改變政權”的情況下，定將宣告無效。伊拉克反對派宣稱，“政權改變”是有利於美國財團的介入，而薩達姆·侯賽因所簽署的合同在法律上是無效的。迪克·切尼的總公司及其購併進來的公司現正專門從事於評估伊拉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有這些公司佔據了勘探廣大地區石油的前線位置。

陣營調整

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人詹姆斯·伍斯利毫不含糊地聲稱：聯合國安理會各成員國之間的商談，是在激烈的討價還價聲中產生的。但與美國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成員國，可與美國分享戰利品，而其他成員國則須看他們未來的結盟趨向。

誠然，控制伊拉克石油不僅使美國在與沙特阿拉伯處於危機時期能保證常規供應，而且還能使美國掌握了對油價施加壓力的手段。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查韋斯的委內瑞拉的實力已被削弱了。如果油價下降到每桶18美元以下，沙特阿拉伯的財政穩定性必將動搖。美國手中還擁有一張強有力的王牌，那就是“改變政權”。油價下降，俄羅斯石油供應必將迅速貶值——而西伯利亞煤油成本是很高的，俄羅斯全國經濟定將感受到這一點。普京及其助手們是知道這一切的。美國已經成功地衝擊了俄羅斯對巴庫（裏海邊）——第比利斯（格魯吉亞）——土耳其的石油管道運輸的壟斷權。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大選期間對布殊的強有力主動權深感不安是十分明顯的。但2002年9月24日，施羅德拜訪貝理雅，標誌著陣營重新調整的第一個階段。德國西門子集團公司總經理波埃爾將發出呼籲說：“德美關係特別重要：基本的政治價值與經濟定位的協議決不應輕易撇開，在熱火朝天的選舉運動中，施羅德定會發表有關伊拉克政策的談話。”環繞在美國立場周圍的陣營重新調整，要比人們所設想的快得多。但對於左翼分子來說，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取實力地位的種種政治花招，卻不值得恭維。

（黃申摘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11月號）



帝國在投下三連贏賭注嗎？

《逆流前進》社評 兆立譯

爲什麼要戰爭？爲什麼現在要？根據一個對「美國戰略利益的風險」的保守、小心的分析，以發動戰爭來征服伊拉克而產生的危險似乎比不打大得多。那就是爲什麼在美國上層人士之間有分歧和爭論，更不用說國際社會的驚恐了。那末，對美國所控制的全球經濟及政治管理制度（我們簡稱之爲帝國主義）到底有什麼察覺到的酬報遠遠超過冒整個地區發生混亂的風險呢？

我們首先必須確定一些基本點：

第一，進攻伊拉克的戰爭不是「即將開始」，它已在十月初開始，因爲美國已擴大對雷達站的轟炸、「特種部隊」已在伊拉克北部出現和傳媒報道了以色列人在伊拉克西部尋找導彈發射站的行動。

第二，美國政府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定並不是尚未作出，它在很早以前就已作出。強使伊拉克「改變政權」的基本藍圖，在布殊就任後不久即已擬就；真正去攻打伊拉克的戰略性決定（雖然不是確切日期）在2001年9月11日以後幾天就差不多確定，與美政府決定攻打阿富汗差不多同時。

第三，這個戰爭慾，與薩達姆政權也許還保留的少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更小的運載這些武器的能力（除非可能作爲戰術性武器被使用在伊拉克境內的戰場上）幾乎無關。可以瞭解的是，普通人民也許會擔心化學、生物、核子武器的擴散，但是如此的擔心與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無關，那個政策是被純粹的征服目標所推動的。

不管怎樣，以任何計量標準，這個令人憎惡的政權，對任何人而言（更不用說對世界超級大國了），是比1980年代的它，「危險性」少得多了，因爲在當時，它真正使用了化學武器來對付伊朗軍隊和伊拉克的庫爾德族人民。相信大家還記得：伊拉克從美國接收了那些武器，在那個時候，薩達姆還與〔美國現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共進「權力午餐」，洽談軍火生意。

讓我們簡短地檢討一下由這個戰爭引起的真正危險，這些危險曾經是精英傳媒和政策專家們爭論戰爭是否「明智」問題的主要題目。

危險一：本是宿敵的伊拉克政權和阿蓋達恐怖網絡也許會被迫爲了殘存和報復而以利害關係爲基礎結成同盟。

危險二：如果空軍的「外科手術式」的襲擊或者暗

殺無法快速推翻這個政權，野蠻的巷戰會接著而來，其結果會是無辜人民的死亡數字不但會非常龐大，更壞的是，會被電視播放到全世界去。

危險三：伊拉克戰爭也許會引起俄國對格魯吉亞共和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或者引起印度—巴基斯坦危機的再度升級（客觀上說來，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

危險四：伊拉克本身也許會分裂——例如如果南部的什葉派人口或者北方的庫爾德人反對新的、美國設立的、專制的中央政府。

危險五：伊拉克戰爭也許會引起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發生動亂，威脅該地區的傳統美國盟友——約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皇族——的穩定與安全。

危險六：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暴烈升級，可能包括以色列沙龍政府所發動的——或者也許被沙龍所協助、但不能完全控制的極右殖民者所觸發的——史無前例的、米洛塞維奇規模的攻擊。

這個惡夢似的景象還可能會包括對佔領區的（如果不是以色列本身殘存）的阿拉伯人實行「人口遷移」（其實是種族清洗）。雖然估計這個可能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可能性已經被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國際新聞界認真地報道，但是美國傳媒幾乎沒有提及此事。依據以色列反折毀房屋委員會的傑夫·哈爾珀的看法，立即放逐數千名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及其他幾個挑選出來的社區領導人是極可能的。

無論如何，當美國政府經過剛過去的春天的短暫不確定時期之後、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總理沙龍對巴勒斯坦平民社會發動野蠻攻勢的時候，已經作出決定：完全以展示、使用勢不可擋的武力將美國—以色列的條款強加給阿拉伯、穆斯林世界。

我們現在要談到目前這個難以置信的危險時刻的一個獨特性。在這些危險中，至少有一些——特別是主要阿拉伯國家的崩潰、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毀滅性攻擊——也許在華盛頓某些「權力走廊」（指左右決策的權力中心）中可被看成爲好機會。

當然、有右翼分子（例如那些與像「新美國世紀」那樣的方案有關連的人們以及極端的以色列說客們）相信，這就是美國權力能夠重塑中東、迫使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伊斯蘭教徒或者任何其他不向美國秩序低頭的人

們完全無條件投降的時刻——也許不會很快再有的時刻。

這些都是受意識形態推動的人們（Richard Perle 和 Paul Wolfowitz [似乎是現任國防部長] 就是兩個典型）。這些人把沙龍看成爲處理中東事務的好榜樣。這些人會更高興地看到沙特阿拉伯被排除出美國戰略盟友的行列。要實現這點，美國對伊拉克巨大、未開發的石油儲藏量的直接控制當然至關重要。

這裡的問題不是美國要「依賴」伊拉克石油的供應，而是權力與控制。石油是朝向以下目的的方法，這個目的是：美國對中東、像它在60或70年前對拉丁美洲所實施那樣的統治。（這個帝國當時不是向拉丁美洲散佈民主與發展的福音嗎？）

在未來的年頭，作爲伊拉克石油的主人，美國可能希望使OPEC [石油輸出國組織] 這個石油生產者的卡特爾變成無關緊要，將石油的世界價格任意定在每桶15美元至45美元之間，和決定從委內瑞拉到沙特阿拉伯到俄國的經濟與政府的命運。

自從1973年中東石油禁運和隨後的排長龍買汽油以來，美國政策一直被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石油輸出國聯合控制西方經濟命脈的權力這個（遠遠大於現實的）幽靈所纏擾。雖然打破OPEC的權力不比表面所看到那樣更會改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各種現實，它都會把石油政治恢復到它們所應有的形狀，像上帝和標準美孚原先所規定的那樣，但不一定按照那個秩序（即上帝第一、標準美孚其次的秩序）。

這不會帶回快速的經濟復甦，但它可能爲一個被經濟衰退和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安龍夢魘所折磨的政府在選舉方面帶來有意義的短期益處。

此外，在美國公司、「文化」（民族主義、宗教）右翼的內部都有強有力的傾向，把現在看成爲黃金機會來擺脫新世界秩序的多方面限制。這個傾向是：隨著對中東和中亞細亞的軍事支配，就有權力強制規定對歐洲的貿易政策，將太空轉變爲我們自己的領土，強行推掉京都環保協議，和國際刑事法庭，消耗便宜礦物燃料、把地球加熱到直至破裂發生。

更大的圖畫

可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不管這個戰爭將會怎樣符合美國的政治、宗教右翼的議事日程，不管這些分子多麼強大地影響現政府的政治，整體看來這個死硬右派並沒有控制美國公司統治階級的政策。

資本家階級作爲一個整體並不是完全不知道在完成軍事征服之後控制、重組伊拉克國家所將要承擔的巨大

費用和複雜事物，更不必說整個中東了。

那末，現在的問題是要解釋，爲什麼美國權勢集團本身，對政府的推動戰爭，作出如此少而弱的限制。經濟的走下坡和管理不善；布殊和 [副總統] 切尼兩人與公司骯髒事件的瓜葛；國際社會對戰爭的憂慮和不安；所有這些都會提供很多很大機會來減慢或停止戰爭的推動，如果這些佔支配地位的經濟精英們選擇這樣做的話。

依據我們的看法，他們從征服伊拉克中所看到的潛在的巨大報償已經壓倒了資本家階級作爲一個整體所應有的正常的「保守主義」。在冷戰後的世界裡，由於沒有一個重要的、對抗的國家權力能夠對美國軍事力量強加限制（反而由於從一連串棘手的地區性危機、非國家的恐怖主義和人民大眾對「全球化」的不滿而來的各種困難），征服的誘惑力已變得格外強大。

把伊拉克想像爲正在完成一個從塞爾維亞開始、接著是阿富汗的帝國三連贏賭賽。在每一種情況中，當政權——對這些政權，美國的政策本來沒有大的反對（當然不會反對它們的殘忍內部鎮壓）——超出了可允許的行爲範圍時，它們便成爲機會目標。

放在一起來看，這三個勝利（至少頭兩個是靠極少的美國傷亡所完成的）證明，不管是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者是通過它自己，或者是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那裡用敲詐和實力榨取來的委任掩護下，美國的權力能夠隨意行使。

不管是在極右、保守或自由的思想中都被認爲是已知的、不受尊敬的異議的是，美國的權力是爭取世界進步和民主的慈善力量，這個權力能行使得越多越好。（更不用說像1980年代的危地馬拉那樣的久遠歷史了，因爲現在還有被美國所支持的軍隊在當地所殺害的農民們的屍體挖掘出來。）

也有將勝利後所得到的問題溶解在下一個勝利的興高采烈之中的誘惑。如果米洛塞維奇以後的科索沃仍然是種族糾紛的危險地區，就來了阿富汗的「解放」；如果塔利班之後的阿富汗是一團糟，我們往前轉到結束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權。

如果這種模糊地類似於環球金字塔式銷售的詭計，也許1990年代後期的股市泡沫就是它的樣本。但是，美國權力的慈善性假設，也是我們在基本上最反對的地方。對我們而言，美國與薩達姆政權的交鋒不是好人與邪惡軸心的對抗；它是一個環球教父對一個出了軌的中級匪徒的同族血仇。

我們絕對要弄清楚：我們從頭到尾都反對這個戰爭，不是因爲它是「單方面的」，不是因爲它是有風險

的，當然不是因為我們對在伊拉克統治的暴君有任何同情，而是因為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所發動的。它是一個確認（和擴張）美國資本主義在全球的至高無上地位的戰爭，而且沒有什麼事情比在這個征服戰爭中的「成功」對這個世界更危險了。

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可是，到最後，美國統治階級以其難以置信的武力和自大，把這個已經開始的戰爭看成是值得去冒的風險，因為這些風險主要是落在那些不太緊要的人們的身上。一般的預料

是，美國的傷亡人數會低，而阿拉伯老百姓的傷亡人數會很巨大；有崩潰危險的經濟和社會是在別人的國家。

在某種意義上，從公司權力的高處來看，這個戰爭看起來像一個主要用賭注來玩的遊戲。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是帝國主義到今天為止所發動的最駭人最有害的冒險之一。自從越戰的早期以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迫需要建立一個頭腦清楚的反戰運動了。

（兆立譯自《逆流前進》2002年11/12月號）

九一一事變以來的國際局勢

黃申摘譯

九·一一事變，暫時在美國心臟地區沒有遭到任何反抗就被利用來為公司利益，特別是大規模石油公司的利益服務。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九·一一事變的影響卻沒有帶來類似這樣癱瘓和沮喪的效應。

華盛頓和華爾街的帝國建設者，特別是以布殊、切尼一伙為首的國際石油集團，目前已在阿富汗建立了由卡爾扎伊領導的傀儡政權。早些時候，前美國尤諾克（Unocal）石油公司僱員卡利爾扎德由布殊總統任命為駐阿富汗特使。這位卡利爾扎德從1990年到1993年原是老布殊政府國防部助理副部長，負責控制石油的政策設計。

有足夠跡象表明，自從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及其小伙伴英國確立了戰略目標，要滲透到前蘇維埃中亞共和國石油資源地區，經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鋪設石油管道，並重申在這個地區的帝國特權。但這在19世紀時是遭到俄羅斯和大英帝國的挑戰的。布殊王朝除了是美國石油壟斷政權之外還能是什麼呢？

「邪惡軸心」

帝國建設者，現在利用「反恐戰爭」作為普遍理由，派遣軍隊到菲律賓、也門、格魯吉亞，重新燃起哥倫比亞內戰，在委內瑞拉製造力圖推翻當選總統查維斯（Chavez），並威脅著要用戰爭來反對「邪惡軸心國」——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鮮。他們公開宣揚入侵伊拉克的計劃。5月，布殊政府還增加另外三個國家——敘利亞、利比亞和古巴到邪惡軸心國名單上。6月，在

一次談話中，布殊宣稱要擴大北大西洋條約國的成員，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包括進來。

但，世界上其他國家則看到是另一類的「邪惡軸心」，這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4月20日舊金山示威者所襲擊的「邪惡軸心」則是「戰爭、種族歧視和貧窮」。4月20日，華盛頓D.C區的示威人數約有75,000-100,000，舊金山則有20,000-40,000，而其他城市舉行的支持巴勒斯坦行動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這有助於削弱這個國家起催眠作用的「愛國主義」氣氛。

襲擊華盛頓和紐約的餘波，會如何影響美國激進派的前景呢？而美國左翼分子應起來作如何回應呢？

一連串疑問

當美國的恐怖情緒稍有減退時，從各方面來的一連串疑問都提出來了。布殊政府是否事先便知道本·拉登的劫機襲擊呢？何時知道呢？5月15日白宮也承認早在2001年8月，布殊政府便已接到了警告。但白宮的新聞秘書阿里·弗萊舍出來否認，他說政府所了解到的只是九·一一以前的那種傳統方式，而不知道本·拉登會使用自殺式的劫機襲擊。

迄今為止，所有這些透露出來的消息，主要是被用來增加保證國家安全的財政援助和軍備的添置。前以色列國會議員尤里·阿夫納里，於2月14日在一份日報的專欄上寫道：「如果我是陰謀學的信仰者，我定將認定

本·拉登是美國的代理人。但由於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只能懷疑這是個巧合。」

本·拉登在那裡？

本·拉登現在如何呢？在美、英軍隊入侵阿富汗，並殺死阿富汗人數要兩倍於九一一事件中的死亡人數之後，這個最大的恐怖主義者本·拉登在那裡呢？

然而，法國《費加羅報》在去年報道說：2001年7月，本·拉登在迪拜的美國醫院裡接受治療，據說那時，他曾會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名高級官員。當時本·拉登已是需要捉拿的在逃者，因為兩次轟炸美國駐外大使館和一次襲擊美驅逐艦科爾號都與他有牽連。7月14日他乘私人飛機離開迪拜，都沒有受到美國情報機關和軍隊的干擾。1998年和2000年，根據華爾街日報，前總統喬治·布殊在沙特阿拉伯私人會見了沙特皇族和本·拉登的家族。在關押中的記者阿布——賈馬爾（Abu-Jamal）寫道：「我們也早已聽到了表示抱歉的聲音了，他們用刺耳的聲音說，可憐的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委實負擔過重了……」這同一聲音恰好為國會兩院提供政治掩護，因為他們需要大量地為這兩個情報機構撥一批經費。

與珍珠港偷襲相類似嗎？

美國政府及其情報機關的無能，有沒有狡猾理由加以辯護呢？美國媒體堅持認為沒有。但也有人作了比較，羅斯福時期的珍珠港偷襲與九一一事件是有類似之處的。

戴維·鍾斯曾經寫道，美國和以色列不可能不知道世貿中心會被襲擊的陰謀，美國情報機關早已深入、持久地滲透到中東的敵對勢力中去。美國政府事先的培訓、財政支持與本·拉登、穆斯林恐怖主義分子合作以及早在1980年便把軍事佈置在阿富汗，所有這一切都加強了這種可能性。現在回顧羅斯福時期，也有足夠證據顯示羅斯福盡其所能刺激日本偷襲珍珠港，他借此機會，作好國內動員工作，以便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參加戰爭，顯然要付出成千上萬美國人生命為代價，為什麼他們不在兩種代價之間作出道義上的區別呢？羅斯福的海軍僕從們說出了其中的道理：珍珠港偷襲中，幾千幾萬生命的喪失是一個很小的代價，但可以借此來轉變美國輿論支持戰爭。

說到底，事實就是統治階級要求得生存，不論是戰爭或和平時期都是不惜以廣大人民的傷亡人數為代價的。

各國工人加強戰鬥

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各國的階級鬥爭在繼續發展，並且強化了。首先在意大利，3月、4月間，大規模宏偉的工人示威遊行和總罷工，約有1300萬人參加，我們編者收到的第一手資料，指出西班牙總罷工人數也達到1000萬人。

在阿根廷，2001年12月19日-20日，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全體人民動員起來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理人——阿根廷政府。從那以後，潛在的革命局勢已經形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此起彼伏，例如布魯克曼服裝廠以及扎農陶瓷廠建立起糾察隊、集會群眾和工人戰鬥隊等便是。至於群眾運動領導者，能否表現出有能力把運動推向前去，並成功地建立工人政府，這猶待觀察。阿根廷一個特殊部門即「勞工旗幟網址」提供國際階級鬥爭關鍵部門的詳細報道。

在法國總統競選中，右翼總統候選人勒龐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後，據估計約有200至300萬人，其中多數是青年，在五一節前湧上街道反對這種法西斯主義的應聲蟲。兩個革命社會主義政黨（托派組織），在4月總統競選中贏得10%選票，而斯大林派——法國共產黨只獲得3.5%。法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CR托派）的總統候選人，27歲的奧利維埃·貝桑塞諾，是名郵電員，贏得第二大青年選舉集團的光榮稱號，這批青年年齡約在18歲-24歲之間。以貝桑塞諾為總統候選人的LCR接到大量青年要求加入同盟的申請書，日前LCR的成員可望增加到一倍。某些有權威的媒體記者警告說，「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切不可忘記群眾叛亂和起而反抗的危險，這很可能使沙特阿拉伯、埃及、約旦的強硬政權遭到推翻。華盛頓策劃者放手讓以色列總理沙龍推行他的反巴勒斯坦政策，必將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以及全世界引起戰火。

全世界勞工運動的興起

據資深的工會活動家、「勞工旗幟」編輯部成員比爾·奧納希3月23日在他的堪薩斯「勞工網址 www.Kclabor.org」上寫道：過去一週是全世界勞工運動最繁忙、最熱烈的一週。今天，約有200萬工人走上羅馬街頭，對改變勞工法和反恐活動性質提出了抗議。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勇敢地表達了他們反對失業人數增加，反對在工資和福利方面受到欺騙。在南朝鮮，上萬名公用事業工人舉行罷工，反對私有化。津巴布韋工會環繞著賄選問題與政府發生衝突。在墨西哥，全國礦工已舉行罷工，而油田工人正以罷工相威脅。在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勞工運動的總動員已有了穩固基

礎，工人們對反勞工的自由黨政府表示強烈的憤慨。

「官方的」世界工會聯盟領導層不得不承認，工人鬥爭的規模不斷擴大並取得了國際性聯繫。保守的國際自由工會同盟，在五一節宣言書中作了如下的論述：

「今年，全世界數量空前的工人走上街頭。他們反對各國政府蓄意縮減工人權利。當經濟失調威脅到每個人的生存時，他們高聲提出抗議，要求全球化壓力必須加以控制……。」這份宣言書還列舉了津巴布韋工人抗議賄選，阿根廷工人罷工，意大利數百萬工人上街以及日本、印度等國全國性抗議活動等等。

美國勞工運動又如何呢？

美國工人中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規模總罷工，更不必說其他各地的勞工鬥爭了。他們怎麼能知道世界的勞工鬥爭呢？美國全國主要媒體對此隻字不提，他們最關心的是歐洲各地的足球賽。如果人們向勞聯——產聯的網址探問「總罷工」時，發來的答覆是1996年巴西駐華盛頓D.C區大使館外的糾察線。此外什麼都沒有了。

美國勞聯——產聯從不提意大利、西班牙總罷工事。如果說提到了什麼具有國際性質的事，只不過是類似國會順利通過某種立法議案等等。工會表達其反對意見的方式，通常只是打電話、寫信或說服國會議員的院外活動，而不是建立糾察隊和舉行示威遊行。如果有人提出接近總罷工的設想，在工會高級領導人看來，不是神經錯亂的跡象便是輕舉妄動的行爲。

正如戴維·鍾斯以及比爾·奧納希在他們的論文中所指出的，美國勞聯——產聯及其前身美國勞工總同盟，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與資本家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任何分歧意見。美國工會高層領導對於資本家冷酷無情地侵犯工人權益和國內人民權益，幾乎沒有任何反應。

在美國何時才會開始實際行動呢？當然，有些行動正在進行中，如洛克希德的兩所製造廠已經舉行罷工。西紅柿製造業工人也已經給貝爾公司帶來許多麻煩，但卡車司機工會、木匠工會和汽車、飛機、農業機械聯合會傳來的信息，彷彿他們的意見仍然是：「對石油巨頭和三大汽車公司有利的，必定是對我們有利的。」最近幾個星期中，美國最高層次的工會運動，仍然與僱主站在一起，這些運動是違背美國廣大工人利益的，只能在有組織工人、環境保衛主義者與學生之間本來只是脆弱的聯盟中，打進一個離間的楔子。

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應當向世界其他各地工人鬥爭範例學習，而開始我們的勞工運動。

工黨聚會與要求權利運動

我們希望即將在華盛頓D.C區舉行的工黨（編者按：有譯「工人黨」）聚會，會對我們這個危險重重的地球上每一國家的工人階級，對他們為長期利益和需要所作的鬥爭，提供巨大貢獻。我們要對工黨活動的特殊方面引起注意，即要求有權組織起來，改善勞工法，維護社會保險以及保障就業權利等等。

工黨的組織者托尼·馬佐契多年來一直主張，勞工運動需要把公開說教轉變為對勞動人民的關懷。工黨運動的目標就是要做到這一點，使工人們能一般地認識到，他們自己工會的黨有必要促進並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

工黨將在這次聚會上開始提出一個新的運動：一切人要免費接受高等教育。勞動人民必須提出自己的利益問題，而工黨要為解決這些問題作鬥爭。

加強公正的醫療保健運動

根據報道，絕大多數美國人十分重視普遍的醫療保健體制。在若干次地區性普選中，工黨在這方面贏得多數選票。有報紙報道說，近年來，美國人關心醫療保健要勝過關心恐怖主義問題，去年發生的多數罷工，都是因工人為維護合同規定的醫療福利，去對抗僱主力圖取消這些福利而引起的。6月間在賓夕法尼亞州赫希廠舉行的罷工，便是一個例子。加強醫療保健運動可使5千萬沒有醫療保險的勞工鬆一口氣。

數十萬美國鋼鐵工人及其家屬，由於鋼鐵工業的破產，正面臨著失去醫療保健福利的危險。但過去兩年，美國聯合鋼鐵工人工會（USWA）與工黨屬下的加利福尼亞護士協會（CNA）合作。CNA是工黨發起的公正醫療保健運動的主力，這樣USWA便參加了這個運動並進行了鬥爭。

USWA工會新主席熱拉爾曾是加拿大勞工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並使加拿大勞工運動獲得節節勝利。3月14日，熱拉爾在美國參院委員會上作證道：「要注意的是，在所有其他工業化國家，醫療保險是由公家提供的，唯有美國對退休人員的醫療保健福利，政府不負一點責任……」（引自2002年5月工黨報）。從那之後美國鋼鐵工會高級領導層，儘管不是自願的，但也不得不參加為爭取公正的醫療保健福利的鬥爭中去。

× × ×

總之，儘管九一一事件後的政治氣氛不同，但全世界工人階級鬥爭的前景，看來是更富有戰鬥性、更加統一協調的。

（黃申摘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02年11月號）

九一一週年後美國工人仍感到餘波

庫塔力克 兆立譯

國土安全

〔《勞工之聲》按：2001年9月12日還沒有過去，電台、電視台等的時事評論員就已經告訴美國人「從今以後一切事情都再不一樣了」。自從那時以後的一年中，工人們已經發現，有些事情已改變了很多，有的事情卻一點也沒改變——但是他們現在都有一個新的邏輯依據，反恐戰爭（the war on terrorism）。要保衛國家安全！這個咒語越來越多地被召喚來掩蓋布殊政府和老闆們的反勞工議程。在公、私營部門調整勞資罷工的各種計劃——許多是九一一之前久已存在的計劃——已經變成新秩序的必要部份。不管是通過大量解僱和其他經濟失調，或者是由於政府政策更直接的影響，勞動人民正在發現，可把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場所改變很多的各種力量正在開始運轉。

九一一後的一年之後，《勞工之聲》觀察了九一一及政府反應的累積下來的影響。〕

立即的餘波

九一一的餘波，對許多工人而言，是立即的。已被結構性弱點所毀壞的經濟之迅速墮入衰退，觸發了一波大規模的解僱。在九一一之後的18個星期之內，430個工作場所的12萬5637名工人，大多數受僱於航空和旅館、旅遊業的，直接由於這個攻擊而遭到解僱。

因此而來的預算赤字，也使許多社區的公務人員的工資遭到凍結。例如，在邁阿密，教師和各類僱員們最近舉行了一次大規模託病怠工來反對這個趨向。

強求工會讓步的攻勢，在世界貿易中心倒塌之前，久已存在，但是有些公司——特別是航空公司——利用這個危機要求取消更多的福利。根據空中服務員協會一位名叫喬舒亞·弗里茨的會員所說，「在九一一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航空公司已開始要求員工團體作出讓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得不這樣要求的理由是，航空業至少有80%的員工加入工會，可能是美國參加工會的員工的百分比最大的行業。」

除了遭受從九一一事件而來的間接打擊以外，數以千計的工人們已直接受到政府基於反恐戰政策的影響。從非公民之被解僱，到剝奪17萬聯邦政府僱員的工會保障權，到徵募工人到全國窺探系統之中，這個衝擊是極為明顯的。努力創立新的國家安全部的意義，對工人而言，不止是成立一個嶄新官僚機構。埋藏在原先35頁的創立國家安全部這個超越機構的法案之內，是在第730節中包含68個字的句子，允許總統任意剝奪新國安部大約17萬僱員的所有集體談判權和權利第5號的文職公務員保障權。

這個68個字的句子要求建立一個新管理制度，那就是「有彈性的」、「現代的」、「以公務人員獎賞和合適度的原則為依據的」管理制度。美國政府僱員聯會會長博比·赫內吉稱這個句子的語言是「一種心態的一個代號，這種心態的目的是逐漸削減公務人員的薪金、醫療保險、退休制度、以功績為基礎的僱用、解僱申訴權利、告密者保護權、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權。」

這個新法案延續了總統在2002年1月7日分頁發的行政命令，剝奪將近一千名司法部僱員的集體談判權。

有的時候，這些工作的反勞工的目的被明確地講出。右派有影響力的傳統基金會智囊的一位副會長邁克爾·弗蘭克在6月20日的《休斯頓記事報》上說，「這個新機構和反恐戰爭就是從現在到選舉之前的保守議程。」

弗蘭克接著說，「堅決保持對工會的管理權、保證種族或性別的僱用目標不被允許（利用）、防止現行工資法律被利用——將是這個爭論的大部份。」弗蘭克與負責推動這個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主席、德克薩斯州眾議員理查·阿邁有強大的聯繫。

目前，美國政府僱員聯會代表大約5萬名將要被合併成國安部的多個機構的僱員。這些機構包括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海岸警衛隊、移民暨歸化局（包括邊界巡邏隊）和聯邦保護局等。聯會的傑姬·西蒙

說，工會正在動員它的會員進行一個壓力運動，要求在該法案的最後版本中撤銷這些反工人的章節。

參議院民主黨提議把反勞工的條文刪去，但是因國會要多天休會，該法案的最後形式尚未決定。可是布殊總統誓言，如果第730節在以後的審議中被刪掉的話，他就要否決。

解僱合法移民

航空暨運輸安全法案禁止非公民的工人擔任機場检查工作。當這個法律在11月19日充分生效的時候，可能有6千以上目前受僱的非公民工人（大約佔全國在機場工作的屏幕檢視員總數的25%）將會被解僱。

絕大多數非公民屏幕檢視員是永久合法居民，許多有多年經驗。除了覺得對將要被解僱的工人不公平以外，積極為工人謀福利的人士擔心，要求工人必須是公民的這種規定將要「波及到機場及其他地方的工作」。

這對西海岸的屏幕檢視員的打擊將會最大。在加利福尼亞州好幾個大機場內，將近80%的屏幕檢視員是移民，多數是菲律賓人。代表許多屏幕檢視員的服務業僱員工會，連同美國民權協會，在今年一月，代表受影響的工人一方，提起訴訟。菲律賓人和爭取和平的正義的積極分子們，已在舊金山灣區，為這個問題，組織了一個基層群眾運動。

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

對工人生活有直接影響的政策改變不局限於經濟領域。司法部透露了一個計劃，名稱為反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要把數以百萬計的美國經濟人拉進一個廣大監視網絡。

根據新成立的公民團隊（一個由聯邦政府管理的志願者團體），反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將會是「一個全國性報告系統，這個系統將會讓這些在其工作程序中容易認出不尋常事件的工人們報告可疑的活動。

司法部與某些大公司的經理部門之間的談判已在7月開始，這些大公司的工人是與公眾時常有接觸的，例如郵差、公用事業僱員、送貨員、船長、卡車司機及列車長等。反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的最終目的是把一百萬工人作為一群潛在告密者，帶進這個系統。

民權鬥士和部份勞工運動已對這個計劃作出抵抗。加利福尼亞州勞工聯盟於7月24日所通過的一個

決議，強烈譴責反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把這個計劃比做納粹德國之努力轉變全國工作大軍為一個告密者及密探的網絡。全國郵遞員協會在7月17日宣佈，它不會與這個計劃合作。不久以後，美國公用事業工會的代表們聲明，「他們不贊成他們的會員成為告密者」。

某些基層工人曾作出更強烈的批評。聯合包裹服務公司的一位司機，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倉庫工人和傭工國際工人兄弟會民主派的一位成員布奇·泰勒在紐約時報專欄版上對反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評論說：「對於『可疑的』這個字，我擔心誰的定義將會被使用。……使我煩惱的是，那些負責保衛我們自由的人們會如此漫不經心地助長這樣一個恐懼和懷疑的氣氛。

「想到我的郵遞員也許會注意我的郵件從那裡來多過注意應該送到哪裡去，使我煩惱。……一個要求像我們這樣的人去做監視工作的方案……威脅到我們在我們每天所服務的社區中已建立的信賴。」

不是勞工運動的每一部門都不贊成反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泰勒的工會主席詹姆士·霍法就欣然接受了這個計劃。根據卡車司機兄弟會的發言人鮑勃·布萊克，「霍法先生說，兄弟會的會員可以是反恐戰爭的眼睛和耳朵。」

反對反恐怖主義情報及預防系統的呼聲高漲，迫使政府縮小這個計劃的範圍。司法部於8月9日宣佈，它不再尋求把郵務及公用事業工人包括在這個行動中。

對罷工潑冷水

布殊政府以關切國家安全為藉口，已對勞工運動支柱之一的西部碼頭工人的合同談判，直接干涉。早在5月中，當碼頭工人工會談判員與僱主坐下來談判時，政府已經開始起草一個回應，這個回應極可能會引用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的禁制令。

自從卡特總統在1978年試圖運用塔夫脫——哈特萊法案來對付煤礦工人罷工以來，該法案的「國家緊急狀況」條文尚未被用過。出乎意料的是，在1978年，對這個禁令作出最強大反應的組織之一是碼頭工人工會。這個工會允諾，如果軍隊被用來管理煤礦，它就會在西部各碼頭發動一日罷工。

〔本文原載於九月號的美國刊物《勞工之聲》，此文譯自2002年10月號《國際觀點》上的轉載。〕

菲律賓反對軍事全球化

塔班班瓦

棉蘭佬島人民的和平運動是長期為棉蘭佬島和平而鬥爭的群眾運動，自9.11之後，這個運動仍在繼續進行，自從美國軍隊部署到菲律賓之後，這個組織已經明顯地加快它的工作。

我們曾經推進回到和平協商和反對軍事全球化的運動。我們也擔心政府在菲律賓人當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人之間製造敵對，由於把所有穆斯林人列為恐怖主義者，因此，而試圖爭取大多數的基督教人口站在他們一邊。

我們正在努力發展這個運動達到國際的水平，特別是近幾個月來在歐洲方面，我們要鼓勵的一件事是：前來棉蘭佬島的國際代表團能帶回該島真實發生著什麼事的準確信息。這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阿羅約正在利用她在別國的支持者寫文章，例如在美國的報章上說：美國軍隊在棉蘭佬島正幹出多麼好的事情——伊·奧·費拉倫說。

現在菲律賓是阿富汗之外最多的反恐怖主義美國軍隊進駐的地方，現在我們有660個美國特種部隊在這個國家的南部，而其他的部隊在北方訓練菲律賓軍隊，他們有幾個團隊則在不同的地區。

最大的集中地是在棉蘭佬島，他們在那裡正在訓練菲律賓軍隊怎樣去佔領或摧毀恐怖分子——阿布沙耶夫組織（Abu Sayyaf）。這些人實際上不到100人，而現在菲律賓軍隊有8000人的部隊包圍著巴西蘭小島執行任務。甚至靠著美國的幫助對付這80個人似乎正在碰到麻煩——這就是在這個國家所稱的阿蓋達網絡。

阿羅約總統是美國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地區反阿蓋達網絡的最可靠同盟者。在9.11之後是她第一個支持布殊的正式要求——甚至在當時，在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領導人還沒有作出表態的時候。

今天對於布殊總統來說，菲律賓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是新自由全球化失敗的活生生證明。

過渡時期的新政府在2001年1月就職之後，我們稱之謂第二階段的人民權力，今天結束了。去年五月在國家和地方選舉之後，執政黨能夠鞏固了國家和地方兩級的控制力，在下議院得到大多數的席位，在上議院得到微弱多數的席位，總統不再依靠曾經對她走上權位有功的同盟者了。

現在她能夠不顧一切地困難地進行審判她所繼承的前總統埃斯特拉達。她要攻擊他，因為在去年年底，埃斯特拉達和他的支持者，企圖通過一個第三階段的人民權力來恢復他控制政府的權力。那是全國人口中最貧窮的部份，這些人曾經在2001年12月被他們鼓動起來過。

當阿羅約走上政權時，曾有一個廣泛的臨時結成的聯盟，這個聯盟，包括左派在內，把她推上了政權。菲律賓共產黨參加競選，並在下議院得到了席位。因為這個幫助，起初，阿羅約曾試圖在左派要求之間進行協調，而現在，她對他們卻毫不妥協了。

我們看到美國的直接軍事介入就像全球化武裝起來的翅膀，而且，也像美國在冷戰後「及時」戰略政策的具體表現。在幾個小時之內，美國能夠調動大量集中的部隊到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島嶼上，無須負擔基地的費用。例如他們從日本沖繩島運送軍隊到菲律賓。美國也準備好了，「如果必要，可以單獨行動，但若能夠，也可以多邊（或多國）進行」。

為什麼要在棉蘭佬島呢？從地理上說，它是東南亞經濟發展區的中心，這個地區包括汶萊、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巴西蘭島就是這個地區的要衝，當然它也是阿布沙耶夫組織的根據地。

菲律賓政府在根源上產生出阿布沙耶夫組織——我們同情他們的5個代表，其中包括兩年前被殺害的主要戰略家。1994年當摩羅各革命派系與政府協商的時候，他們發起這個組織。對於重要的各派的加入，正是成熟的時候，以提供選擇革命的思想。

阿布沙耶夫主要成長於1996年，摩羅各派和政府之間和平協議之後，當然，這個協議破裂的時候，它吸引了許多追隨者。

我們看到在政府對美國支持和軍隊出現之間的連繫。正好像布殊那樣，總統阿羅約的父親也是一個總統，並且在她擔任上議院議員時，就非常支持美國在菲律賓的基地政策。她是一個非常熱烈的小布殊追隨者——她採納他的口號：「子彈是為了麵包」，「安全是為了自由」。她要求實行一個竭盡全力的戰爭，去反對菲律賓的阿蓋達網絡——此時，她所真正擔心的是2004年的總統選舉，現在保持中立的派別將可能成為她的對手。

去年底，謠言盛行，說將會發生一場政變，這個謠言迫使她宣稱要更換國家的警察首腦。可是現在美國的軍隊來了，她就改變了主意，不僅要使這個人繼續他的工作，甚至延長了他的任期。美國軍隊使她在兩方面都有信心繼續統治，和為2004年的選舉作好準備。

這種形勢給予菲律賓不同的革命左派得到一個一起行動的機會。那些在1991年積極主張取消美國軍事基地的，現在又回來作為運動的主流。來自左派（不包括共產黨）的不同的群眾，正在試圖重新集結在這一主流後面，並且組成和平同盟。我們正在聯繫鬥爭，反對全球化和美國的軍事勢力。

棉蘭佬島革命工人黨在戰鬥中是積極的，特別是在棉蘭佬島。我們存在於到處都是軍隊的該島，通過工作，我們正在與其他左派組織更為強大的合作——特別是菲律賓社會黨（這個黨同在澳大利亞的民主社會黨（DSP）有聯繫），以及菲律賓工人黨、菲律賓無產階級黨。

今天，政府已經同所有的不同武裝組織中斷和平

談判，這就意味著美國軍隊能夠在軍事上反對他們。新人民軍，共產黨的軍事派系已經被布殊列入恐怖主義組織的名單。

摩羅穆斯林自由戰線最擔心美國軍隊的存在，尤其是在巴士蘭，因為他們有近兩千人的武裝在這個島上。他們認為存在一種危險，他們將會被等同於阿布沙耶夫成員。

有一種真正的可能，那就是：不是阿布沙耶夫的成員也將會被殺害。恰恰在此之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殺了三名被他們誤認為是阿布沙耶夫組織的人（而當地的媒體卻證明他們不是），他們正在烹煮豬肉，當然不是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

政府曾爭辯說，那只有兩個選擇：或者你是為了阿布沙耶夫，還是為了美國軍隊。他們曾在電視上放映錄像，阿布沙耶夫從1995年起就執行砍頭的刑罰。對於我們來說，教育人民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我們必須譴責政府和美軍兩者。

（柳真摘譯）

走向第三屆世界社會論壇

曼庫諾

即將在阿雷格里港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社會論壇，是正在建立中的政治空間——也即是開拓理想社會並抵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帝國主義的政治空間。其整個歷程是集中、聯繫社會運動、民間組織、持批評態度的知識份子、新的政治先行者和激進的活動家。基本的綱領性文件便是“原則憲章”，其方法是分掌民主制並尊重不同意見。在頭兩屆世界社會論壇取得了非凡勝利之後，目前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優先性，是要通過本大陸的、地區性的和主題的論壇，使整個歷程國際化，同時還要開展有關戰略和理想社會的大討論。

第一、二屆論壇的主要會議是環繞在四大軸心而組織起來的，這四大軸心是財富的創造，財富的掌握，市民社會和政治權利。

第三屆論壇必須以集體力量確立戰略思維，進一步討論有關國際權力的結構，軍國主義化與和平，人

的權利並同偏執和不可容性作鬥爭，還要繼續討論文化、信息和反霸權主義，以及全球運動對國際體制、經濟利益和權力問題的態度。

最基本問題之一是：運動中的各不同勢力是否樂意形成這樣的戰略。反帝國主義全球化運動，並不缺乏熱情和戰鬥性。但我們必須現實地掌握目前的國際形勢。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所想所為，越來越更像一個有絕對統治權的帝國了，它拋棄了多邊主義和人權，甚至拋棄了在以前幾十年間掛在口頭上的民主辭句。現在這個帝國在世界100多國家中佔有800多軍事基地，並擁有無可匹敵的經濟和科技力量。

我們面對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北美超級大國所支配的國際形勢，能夠做點甚麼才能使國際關係和國際體制民主化呢？我們如何才能贏得並保持和平，如何才能根除世界各民族遭受到的饑餓、疾病以及外債

的壓力呢？我們又如何才能使整個地球從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瘋狂破壞中解放出來呢？

世界社會論壇是反對帝國主義全盤反革命的激進派，因為論壇是革命的形象，具有革命的動力。正如V.阿格諾列托(V. Agnoletto)所指出的：“我們是反戰、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運動，我們是嶄新的、急進的力量，我們是唯一有活力的、民主的可供選擇的道路來取代恐怖主義”。

斯大林主義早已退出歷史舞台了，社會民主主義已轉化為社會自由主義，正經歷著一個深刻危機，第三條道路決不是取代資本主義的理想道路。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左派，在阿雷格里論壇精神鼓舞下，培育出新的統治文化，正在歐洲和拉美社會及其選民中日復一日地壯大起來。我們希望2003年世界社會論壇能在建立革命運動中達到一個新的台階，並克服戰略上的不足。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戰略”。我們需要解答兩個最基本問題：（1）

我們需要建立的另一世界是怎樣的世界？（2）我們如何才能建立這個新世界？我們早已有了新戰略概念的核心思想，來引導我們走向建設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有著更大的公正性、平等和團結一致。這一概念是在下列條件下產生的，那就是在民主化的政權與社會運動之間日益壯大的結盟得到了“相互配合與獨一無二”的發展。民主化的政權和社會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改變世界。這就是在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的綜合概念。

厄內斯特·布洛克認為，烏托邦實際上就是“烏托邦的遠景”——理想主義社會的遠景——我們朝這個方向走去，但永遠不能到達。這旅程有其意義，有其方向，但我們永遠也無法到達旅程的盡頭。這是最根本的戰略概念，只因為這戰略概念創造了運動，修築了道路，而最後永遠也不應放棄鬥爭。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02年12月／03年1月號）



巴西：人民的勝利

——關於民族協調的決議

社會主義民主派

1. 2002年10月選舉結果表明：巴西各政治勢力的關係對比有了巨大改變。巴西工人黨贏得了共和國的總統職位，盧拉得票率為61%，成為國會中最大的黨，共有眾議員91人，參議員14人。工人黨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對新自由主義是一個慘重的打擊。工人黨和盧拉，是在與維護人民利益保持一致的歷史基礎上，起到了催化劑作用，以求達到轉變的願望。這一發展過程在人民中喚起一種理想，使這次選舉能在兩種社會選擇（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衝突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工人黨雖在州政府選舉中取得一些重大勝利，如在阿克利州、南馬托格羅索州和皮奧伊州，但失去了南里奧格蘭德州。此外，PSDB（巴西社會民主黨）和PMDB（巴西民主運動黨，是資產階級反對軍事獨裁的黨派，現時是統治聯盟的一部份——譯者）兩個黨贏得了大部份主要州政府。

工人黨勝利所表現出來的各政治勢力關係對比的變化，受到了三種因素的限制，第一與右派集團結盟；第二曾作出承諾繼續執行經濟政策的主要因素；第三所謂“不可避免地”要保持同國際貨幣基金會協議及其後果。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最近一段時期中，缺乏具有歷史意義的廣大群眾社會總動員。

2．選舉運動為巴西打開了新的政治局面。一方面，我們還處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這表現在新自由主義政策還在繼續推行中，國際性經濟衰退，各國保護主義的增長，美國的干涉主義和單邊主義，右傾民族主義的擴散等等。多年來，巴西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了災難性的經濟和社會惡果，人民更加不滿，社會危機加深，在未來很長時期內，仍然無法得到解決。

但另一方面，只要巴西社會的這種矛盾繼續下去，各人民民主集團將再度動員起來，定能加強社會主義左派。統治階級建立起來的霸權主義，已遭到打擊，這就為建設人民民主社會，創造了更優越的條件。

3．目前盧拉政府的性質尚未可知。盧拉政府是在人民期望改變國家面貌的基礎上當選的，是反對費爾南多·卡多索舊政府的主要體現。但由於在競選中與右翼結盟，作出的決定有害於黨內民主以及對統治階級精英份子和市場經濟提出了保證，都表明令人擔憂的是今後巴西的政治方向，而這一點我們早在競選運動過程中已經表達出來了。

盧拉政府的性質將會在社會和政治衝突的進程中明確起來。工人黨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確保議會和社會大多數去支持變革。

除策略上的主動性之外，戰略上也必須作出明確選擇——是加強民主、人民陣營的社會基礎，還是向我們的敵手作出讓步呢？是在大眾參與的民主基礎上實行真理，還是以傳統方式實行管理呢？是建立新霸權主義，還是立即停止這種倒退行為呢？我們的選擇就要超越加在新政府之上的種種限制。

4．巴西很容易受到國內、國際財政資本投機性活動的打擊，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監控目的在於使新政府繼續作為“市場”的抵押品。因此，為了重新獲得政府的自主性，確保國家主權的完整，必須成為關鍵性的戰略目標。

一系列戰略性問題早已提到了新政府的面前，這就是：實行土地改革，面對自由貿易區的威脅要確保國家主權的完整性，反對屈服於國際貨幣基金會，調整金融體制，特別是政府與中央銀行的關係，還有稅收問題，在所有這些問題中，保護民主和國家主權、反對屈服於美帝國主義和投機資本是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的。工人黨的勝利已經創造了新的政治條件，所有上述問題不僅是政府的問題，而且必須成為全社會的問題。保護國家主權完整，也就是保護行使人民主權和真正民主的主要條件。

5．2001年底工人黨在全國大會的決議中提出的新的社會契約觀，是總統競選運動中的中心主題，決議號召全社會要積極支持生產、經濟增長和國內市場。工人黨一再批評資產階級政府對社會契約的建議，因為這些建議實質上是要使極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屈服於資產階級政府的要求。我們必須維護的是：新的社會契約要建立在公眾參與民主以及存在著廣大民主空間的基礎上，以便解決因新政府要終止歷史性地忽視大多數人民利益而引起的衝突。

6．民主的群眾運動已開始運用空前的歷史經驗。工人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派將其自身看成是這一進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同來承擔巴西左派面臨的挑戰。我們要推動工人黨把這種具有決定性經驗同下列鬥爭結合起來，即克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克服市場暴政，寄生性財政資本、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歷史性的排斥主義。我們的前景是：要把這種經驗結合到以民主的、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去取代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去。

7．當前最直接的挑戰，便是盧拉政府的組建問題。我們可通過在工人黨內和機構的干預作用，並根據黨的最先進經驗，設法保證組建工作能民主地進行。強大的工人黨今天是巴西社會的主要政治勢力。黨在聯邦政府的組成中應有自己的發言權。與此同時，我們堅持在即將來到的時期內，黨在上次全國大會上通過的決議必會得到維護和更新。其中中心思想是：與新自由主義模式決裂，在國家主權完整的基礎上得到發展，權力和收入的再分配，盧拉政府的經驗應有利於恢復社會主義價值。要能體現出黨有能力形成戰略觀點，在偉大政治變革前夕能夠團結一致。在此新的歷史時刻，保存這種能力是極端重要的。

8．選舉結果從質上改變了工人黨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且影響到黨建設的全過程。工人黨正在發展壯大，但同時在政治上也成為成份比較複雜的集體。如果政府的責任感要求進行辯論時，必須小心謹慎，但這不應該妨礙爭論、決策的民主進程。我們應意識到觀點的多樣化是運動建設中的力量源泉。當選的國會議員的黨內份子與富有活力的社會活動之間的緊密關係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如果說工人黨在競選運動中受到來自統治階級的精英份子、“市場”以及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則工人黨成為聯邦政府的首腦時，這種壓力將必加重。

但同樣確實的是，從投票箱中得到的授權指令，給了我們以合法性，可在巴西社會推行深刻的變革。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02年12月／03年1月號）

巴西工人黨與2002年全國大選

社會主義民主派

〔編者按：巴西的10月27日選舉結果，表現出該國社會力量關係的重大變化。巴西工人黨的總統候選人盧拉贏得了第二輪選舉，得票61%，擊敗了右翼候選人馬勒夫，而正式成為巴西共和國總統；同時，該黨在國會中的席位增加到91席，和14位參議員，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該黨認為，這次勝利是巴西人民的勝利。以下的第一篇節譯文件，是該黨的左派「社會主義民主」的公開文告，在這次選舉之前3個月發出的。本刊以前幾期也曾刊載有關該黨的文章，今後也希望繼續加以譯載。〕

我們十分關切地注視著我黨領導層內的多數派，在選舉運動中特別是在總統及各州選舉中所採取的方針路線。現在作出的決定，要同右翼黨，即自由黨結為主要同盟，這樣，我們的綱領、立場會受到扭曲，黨內民主會受到侵犯，但這些都是工人黨要在巴西社會中發揮作用的十分重大的問題。

基本的問題在於：在目前複雜的形勢下，我們應如何開展競選活動，開展得好，就會在選舉上，政治上取得勝利，會實現我黨歷史性目標，會掌握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就可以在巴西推動我們所希望建立的那個社會的民主革命。

必須再次說明的是：競選應是我們爭取另一種社會的時機。在競爭中，使我們能建設起一支有足夠強大的政治力量，能使我們選出來的候選人落實我們的政綱。如果在選舉中，我們不能爭取到對我們主張的支持，不能分清人民的敵人是誰，不能動員和領導群眾，則我們就會成為人民敵人的人質，即使我們被選進了政府權力機構，也不能擺脫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表的利益及其強大的約束網。

我們在2002年的選舉中最大的利害關係是：要建設一個21世紀型的國家。選舉過程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國民經濟的發展。聯邦政府推卸對危機的責任，阻止討論可供選擇的根本道路，並利用經濟恐怖主義以利於政府提出的候選人，迫使反對派屈服於金融市場的利益，加深國家的依賴性，給市場提供巨大

的杠杆作用，而現在卻不懷好意地要求反對派作出承諾——留在經濟管理的「正確道路」上。

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主席費雪爾、大投機家索羅斯等人，把市場貿易壓力加到工人黨候選人盧拉身上，這表明他毫不懷疑地把我們視為敵人，而且要確保巴西仍然受資本和國際市場的獨裁統治。

聯邦政府候選人和資產階級政黨，申明要修改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實質上並無修改，仍然留在原有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之內，仍然留在現政策的反民族、反社會的基礎之上。政府集團的反民主性質越來越更明顯了，甚至利用聯邦警察來反對工人黨。

除了工人黨候選人盧拉和政府集團候選人塞拉之外，還有第三個候選人戈梅斯（Gomes），戈梅斯是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主要代表，曾任過巴西部長，20世紀九十年代初，他穩定巴西貨幣和結束高通脹率而深受眾望，現在他取得了自由勢力黨（PFL）的支持，也得到不滿現政府的部份人的同情，但他仍然害怕改變現狀。

我們的黨——工人黨，主張徹底民主化，主張在人民群眾中展開對我黨政綱的轟轟烈烈討論。只有在那時，我們才能把人民動員起來，取得社會合法性，並與市場邏輯決裂，進而贏得選舉，開始實現我們政府的綱領。

堅定不移地與現存模式決裂

巴西極大多數人民所要求的改變，只可能通過廣泛的群眾運動，使我們走上政權，支持我們承擔社會、政治和經濟改革，因此就必須分清走向兩極的相互對抗的兩種綱領。一極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分子，包括卡多索（F. H. Cardoso）的政府和資產階級反對派。這一極也表示要改革的，但不希望同現存模式決裂。另一極便是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青年、婦女、失業者和社會活動分子，他們所追求的是要同盛行的現存模式決裂。勝利不能建立在模稜兩可的觀念上，而

要作出明確的選擇，提出肯定的主張。

工人黨於2001年10月第12次全國黨代會上通過的文獻《工人黨為巴西政府擬訂的政綱概念和方針路線》，這是與新自由主義的綱領截然不同的。在工人黨內部有關選舉問題的爭論期內，意見分歧很大，但經過多次修改，終於在12大上通過了這份文獻，概括地反映了黨的集中立場。

這一方針、路線回到了建黨時期所形成的綱領路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召開的第5次黨代會上，我們決定推舉盧拉第一次參加總統選舉。就在那次黨代會上，「人民民主的戰略方案」便已形成了。現在的戰略方案儘管比1987年提出的方案，在徹底性方面有了一些後退，但這一方針路線仍然反映出政府綱領的「人民民主」性質，並且指出：「毫無疑問，民主的人民政府必將實現真正的、全面地與現存模式決裂，為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奠定了基礎」。因此，工人黨明確地拒絕了德·拉·魯阿（De La Rúa）任總統時期所推行的蛻化墮落、災難重重的方案。

為了防止對巴西統治階級所謂進步性的幻想，我黨在文獻中提出落實我們政府綱領的可能性，只有同統治巴西數十年的一系列保守協定割斷聯繫，而要組成一個新的勢力聯盟。

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拉美鬥爭的興起

工人黨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反映了人民鬥爭的深刻性，並對新自由主義的方案提出了可疑性，這不僅在巴西，而且也在國際上已經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事實上，國際階級鬥爭的面貌已向積極方面轉變。自從出現國際性反抗運動以來，日益加劇的經濟不穩、一系列危機都在削弱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合法性，提高了人民的反抗性。

拉丁美洲的社會、政治危機因全球經濟蕭條而加劇了，並且對本地區產生很大影響，例如外債增加了。整個拉美地區由於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引進，導致貧窮和失業人數增加。終致拉美國家無法承受國際資本的壓力。美帝國主義的野心更大，它企圖通過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把新殖民主義強加在拉美地區。更重要的是，我們切不可忘記，隨同自由貿易區一起到來的，還有美國軍事力量在本地區的出現，民主自由受到了制約，像美洲國家組織（OAS）這樣地區性機構的作用會發生變化。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拉美地區已經進一步地改變了殘缺不全的、分散性的鬥爭形式，而經歷過一

段時期的重新動員、重新組織的社會運動。阿根廷的十二月暴動、美帝國主義在委內瑞拉搞軍事政變的失敗、巴西社會鬥爭的加強以及左派勢力的興起、烏拉圭人民的總動員以及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人民鬥爭的普及等等，再一次地證實了階級鬥爭新時期的到來。

這一發展過程，是與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加強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也反映出國際主義的再度出現。巴西阿雷格爾港的世界社會論壇便是一個實例。

需要的是富有凝聚力的結盟

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應當尋求社會的和政治上的盟友，也包括在選舉中的盟友，但必須在綱領達成一致協議的基礎上。實際上，能夠推行深刻社會改革的政府，需要在綱領與盟友之間的凝聚力，要建立一個廣泛的群眾動員和社會全面民主化的框架，如果與中派、中——右派或右派政黨結盟，就不可能保證這種凝聚力和總動員。為了加強這個社會主義民主黨的實力，就必須在政治上與右派脫離關係，在道德上杜絕腐敗行為，這才可能反映出絕大多數人民鬥爭的願望。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的領袖奎爾夏（O. Quercia）以及其他知名領導人，巴西的自由黨（PL）領導人，都曾有過與大資本家相勾結的醜聞，我們決不可與他們結盟。

我們黨在12大上通過的決議，雖然批准了可把同盟者擴大到與中派結盟，但決不允許與右派結盟。結盟的基礎是在綱領上要達成一致協議，必須具有凝聚力。

社會主義的前景

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失敗，表明資本主義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也談不上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社會的公正。我們相信，我們走上政權的可能性必須要與廣泛深刻的變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相聯繫。目前國際形勢的發展是有利於我們的。工人黨第12次黨代會上通過的文獻，其中第54條已把情況說得一清二楚了。我們必須要以各民族的大團結和國際主義去對抗資本和市場的全球化。

工人黨在選舉中獲勝，將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歡呼。與最近在各地，特別是在歐洲選舉中，右派勢力得勝相對照，巴西的左派政府定將打開走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大門。

對多數派領導立場的批判

我們對工人黨領導層中的多數派，在三個基本方

面的立場，必須提出批判。這三個基本方面是：有關選舉運動的綱領性內容的表達；對同盟者的界定；黨的內部活動。

第一，在「市場」壓力面前，我們的候選人所採取的立場，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正確地指責卡多索政府推卸危機責任，並重申工人黨所受的約束應有所改變。但另一方面，他們屈服於壓力，把黨在12大上通過的綱領性決議，降到次要地位。更糟糕的是，他們聲稱未來工人黨組成的政府，仍然保持現在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盧拉給巴西人民的信就綜合了所有這些相互矛盾的觀點。

異常明顯的是，工人黨的任一聲明，若果有利於保持現有經濟政策的連續性，那就無異於讓政府候選人佔了上風。此外，希圖安撫「市場」作法已經帶來一定後果。政府經濟學家以及其他政府代言人都已認識到盧拉所作的種種努力，實際上是向他們的立場靠近了，他們還希望盧拉繼續向這條路上走下去，並向盧拉提出忠告，必須爭取到他們的信任，他們說：「聲譽要受時間檢驗，從現在開始還需要好多年，然後才能考慮盧拉是不是市場的朋友」。

就盧拉這方面來說，最佳的措施並不是宣佈放棄候選人資格，而是要加強與大多數人民的理解，人民的利益與銀行家、投機者們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只有這樣才能爭取到大多數人民去克服建設新國家的重重障礙。

工人黨領導層中多數派的第二、第三個基本方面，是有關結盟的政策和黨內活動。這兩方面都應當提出批判。

工人黨如同自由黨（PL）達成選舉協議，這就明顯地與右翼黨結盟了（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工人黨與自由黨結盟，只會為自由黨創造條件，讓該黨掌握到更多的代表當選。但在聖保羅州、里約熱內盧州、巴伊亞（Bahia）州裡，自由黨和工人黨各州的地方組織達成協議，卻得不到好處，自由黨便拋開協議，自行其是了，甚至支持候選人如馬勒夫（Maluf）等，這個事實只能證明自由黨的政策是前後一致的，而政策的不一致性是在工人黨領導層中的多數派方面。

盧拉所堅持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他並不希望爭取黨的支持，而寧願爭取到更多的電視台的廣播時間，甚至爭取大企業主作他的副總統。

阿拉戈斯（Alagoas）州的例子是：工人黨領導層的多數派強要州組織與自由黨達成選舉協議，這是違背阿拉戈斯州建黨的歷史，也違反了黨員積極分子

的意願，喪失了有可能控制州政府的機會，而這個州政府完全能擺脫大企業主的桎梏，消滅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因此工人黨阿拉戈斯州組織全體一致反對這種協定，而海倫娜（H. Helena）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放棄了候選人資格。與自由黨結盟的政策引起全黨的爭論，迄今為止爭論並未得出最後結論，但黨的多數派領導卻把這個政策強加給工人黨。

我們歷來為建設一個民主的黨而鬥爭，黨的集體決議必須受到尊重，特別是黨代會上通過的詳細決議。黨的候選人不能超越黨，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唯有黨內民主，才能使我們增強信心去維護社會的民主。

與自由黨結盟怎麼有可能改造我們的國家呢？向市場提出保證、與中、右派結盟的政策是由黨領導多數派推行，他們的論點是：可以提高盧拉的當選機會。即使這是確實的，理由也不充分。我們的最終目標並不是選舉中獲勝，而是不能拋棄我們的政綱，不能失掉我們的凝聚力和前後一貫立場。

值得懷疑的是：黨玩政治遊戲，未必有利於選舉。唯有黨的凝聚力，黨的傳統是最大的優勢，也有利於選舉。試圖以參議員、右翼黨人艾林卡（J. Alencar）為副總統候選人，未必有助於盧拉的當選，而且這是與盧拉以及工人黨整過歷史相矛盾的。如果盧拉要維護現總統卡多索的政策，只能有利於右翼總統候選人塞拉和戈梅斯。

總之，我們的批判是來自人民，人民是要為工人黨的勝利而鬥爭，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主張根本改革的政府，使人權普遍化，有人民組織的參加。這個政府要走向建設社會主義、消滅一切壓迫和剝削這個最終目標。

現在工人黨內所發生的一切，切不可視為小小的偶然事件，應該將其看作是工人黨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黨的前途而發生的一場具有風險性的鬥爭。

（黃申節譯自《國際觀點》02年10月號）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九)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七章

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 (上)

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同時是法西斯主義理論的歷史。一個適當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曾經是、而且仍然是有效的反法西斯主義（以下有時簡稱反法西斯）實施的先決條件。因為，沒有其他新興的近代社會現象，像法西斯主義那樣，它的興起與對它的解釋是如此顯著地同時發生的。

這種同時發生的理由是明顯的。法西斯主義是突然、立刻興起的；它首先威脅、粉碎了數以萬計人民的生活條件，然後威脅、粉碎了他們的生命。對於無數的人而言，歷史命運和個人命運突然結合在一起。可理解的是，那些受這個事件影響的人們試圖理解已降臨至他們頭上的命運。法西斯黨徒們在意大利發動的第一次縱火攻擊，立刻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個法西斯主義是甚麼？”這個問題已經把工人階級運動的主要思想家們、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們和歷史學家們攝住了70年。

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內政治反革命的勝利，就當代社會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思想而言，是與斯大林主義一樣地難以概念化的。這裏又是托洛茨基，在解釋這個現象方面，遠遠超過他的同時代人。沒有其他思想家如此清楚地理解法西斯主義的性質、它所典型地反映的、對工人階級運動、對人類文明的威脅。只有他一人及時警告了工人階級這個危險，堅持主張打敗它的必要性，並且詳細製訂了必要的抵抗方法。如果說，除了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之外，沒有其他對當代政治、社會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在深度上、清晰度上，能與托洛茨基從1929年到1933年論德國問題的著作相比擬，這不會是言過其實的。〈1〉

托洛茨基的熱情介入，他多次為這個威脅德國及歐洲工人階級運動和其實是整個民族的可怕危險所作出的

卡桑德拉〔預言雖準但不見信於人〕的呼聲，從開始就建基在對這個新歷史現象有清楚的、雖然在理論上複雜的瞭解上。我們很少像在托洛茨基從1930年到40年論法西斯主義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樣，找到理論洞察力、具體的政治分析和對政治實踐的指導這三方面如此立刻、如此直接的符合。

法西斯主義有甚麼特點？

法西斯主義是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生嚴重的體制危機的產物，在這個危機中，正常的資本增值，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條件下，正漸增地被破壞。在經濟和各政治機構發生這個危機的同時，在失去社會地位的社會層份中間，主要是在小資產階級中間，有正在激進化的不滿份子，以及他們的日益增多以新形式群眾組織出現的組織。〈2〉起初這些組織的活動是自發的，後來它們就漸增地被大企業利用來企圖破壞工會運動，使工人階級支離破碎。這個很簡短的解釋，就是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義理論的核心。

有力地幫助托氏探討法西斯主義這個現象的，是他所透徹掌握的不平衡及綜合發展規律：那個被應用到階級社會的唯辯證法的綜合體。像其他幾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例如埃恩斯特·波洛克、克特·杜卻爾斯基）一樣，他理解到社會——經濟形式與意識形態形成的局部非同時性；換句話說，理解到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思想、感情和非理性形象繼續在很大部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是在瀕臨貧窮的中產階級之中，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在資產階級、失去社會地位的知識份子、甚至工人階級的某些層份中）存在這個事實。

托洛茨基從這個理解出發，得出以下的社會、政治結論：在日益難以克服的社會——經濟階級衝突漸增的壓力下，中等階級的重大部份與以上所提到的其他社會層份——即托氏所如此恰當描述的人類流沙——熔化在一起，形成了強有力的群眾運動。這個群眾運動，受了極有魅力的領袖的催眠、部份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構提供武器之後，就作為一種攻堅物，通過恐嚇與血腥恐怖行動來擊碎工人階級運動，使工人階級支離破碎。

不平衡及綜合發展規律在法西斯問題上的這種應

用，使托洛茨基可能避免兩個錯誤的對法西斯主義的片面觀點：要麼把它看成重新陷入前資本主義的反動和蒙昧主義，要麼把它看成一種遲到的、“正追趕上去”的現代化形式。〈3〉事實上，法西斯主義思想和它的規則都包含這兩個“在邏輯上”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歷史辯證法並不遵照形式邏輯的規律。沒有理解這一點，是許許多多反對法西斯的人士的不幸。〈4〉

它也是許多更晚的解釋的弱點。這個對法西斯主義的分析，統一結合了幾個分析元素。每一個元素有其相對的自主性，並且相當於帝國主義國家在深刻的社會——經濟危機中的各個特別方面的社會、政治現實。這些元素的結合——並不是它們的簡單的並列——為理解法西斯這個現象興起的全貌，提供了一個工具。

法西斯主義與小資產階級

法西斯主義思想體系及其政治團體，是從中產階級在獨佔資本的權力和工會權力之間受到折磨後感到氣惱和絕望的時刻，不顧資本家階級的眼前需要而開展的。

（他們的思想的相對獨立性是另一回事。種族主義是深深地植根在殖民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思想體系之中，雖然它是與資產階級誕生以前的偏見殘餘有關。）

在開始階段，有許多這樣的小團體，它們擁護各自的“元首”候選人，進行劇烈的競爭。〈5〉只在一段複雜的篩選過程之後，一位領袖才從這個底層社會鬥雞似的競賽中出現。能夠上選的，不但有魅力的個性，而且極度無道德原則，甚至於具有犧牲他自己的親密盟友的能耐。

當小資產階級受到晚期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沉重打擊以致變得越來越絕望、越來越沒有希望的時候（通貨膨脹、小生意破產以及學者、技術人員及中高級公務員大量失業），至少這個社會階級的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懷舊、心理上怨恨的混合心境激發下，將會逐漸採取有點狂野的觀點，從事暴力行動。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小資產階級變成狂野的一個群眾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我們發現這樣的兩方面結合：一方面是極端民族主義，另一方面至少是口頭上反資本主義的煽動，〈6〉但是帶有對工會運動更大的仇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反對工會頭子”）。當如此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開始用傷害人體的暴力來對付工人們、工人們的行動及其群眾組織的時候，法西斯主義政黨就開始了。

托洛茨基精闢地總結了這些狂野的小資產階級自發興起的社會——意識形態背景：

德國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快速增長並

不意味著中產階級的簡易毀滅。雖然它毀滅了小資產階級的某些層份，它也重新創造了其他層份：在工廠周圍有工匠、店主；在工廠內有技術人員和經理。但是，在保存、甚至增加他們自己數量（新、舊小資產階級加在一起不到德國民族一半〈7〉）的同時，中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獨立的最後陰影。他們生活在大規模工廠和銀行制度的邊緣，靠壟斷集團和卡特爾的桌子上掉下來的麵包屑過日子，靠他們的職業理論家和政客的精神救濟品過日子。

戰後的混亂打擊工匠、小販和公務員，與打擊工人一樣殘忍。農業的經濟危機正在毀滅農民階級。由於無產階級本身在趕出長期失業者大軍，中間層份的衰落並不意味著這個層份被轉變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窮化，在人造絲的領帶和襪子勉強遮蓋下，逐步毀壞一切官方的信條、首先是一切民主議會主義的教條。

政黨的多種多樣，選舉的冰冷而又狂熱，政府部門的經常更改，以創造一個貧瘠的政治結合的萬花筒，加劇了社會危機。在被戰爭、失敗、賠款、通貨膨脹、魯爾區被佔領、危機、需要和絕望弄到白熱化的氣氛中，小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所有欺騙過它的舊政黨。〈8〉小業主們尖銳的抱怨，從來離不開破產，他們的兒子雖有大學學歷，但是沒有職位和顧客，他們的女兒沒有嫁妝和求婚者，要求秩序和嚴厲的手段。

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幟是由舊軍隊和低級指揮層中自命不凡的傢伙們所舉起的。胸前掛著因傑出服務而獲得的勳章的軍官、士兵們，不願意相信，他們的英雄主義和為祖國受苦，不但無足輕重，而且沒有使他們得到特別的感激。因此，他們就恨革命和無產階級。在這同時，他們不甘心被銀行家、工業家、部長們調回來擔任簿記員、工程師、郵政人員和教師等不太高的職位。因此，才得出了他們的“社會主義”。在依瑟（Yser）這個地方〔相信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發生激戰的地方〕，在凡爾登的指揮下，他們學會了怎樣使他們自己及其他人冒生命危險、怎樣說指揮性的語言。這些冒險、這些指揮語言有力地嚇服在戰線之後的小資產階級。因此，這些軍官、士兵們變成了領導……。

小資產階級仇視發達，因為發達老是違反他的利益；進步除了帶給他不能清償的債務以外別無他物。國家社會主義不但排斥馬克思主義，而且排斥達爾文進化論。〈9〉納粹份子們詛咒物質主義，因為技術之戰勝自然已意味著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勝利。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們清除“智力主義”，因為他們只有二等、三等的智力，尤其是因為他們的歷史任務不允許他們將單一思想追究到底。小資產階級份子需要一個較高的權威，這個

權威處在物質、歷史之上，不受競爭、通貨膨脹、危機和拍賣台的干擾。在他們心目中，國家唯心主義之作爲英雄的靈感泉源，是與（二十、十九、十八世紀的）進化論、唯物思想和理性主義對立的。希特勒的國家，是小資產階級本身在神話中的陰影，是一個對千年帝國的可悲妄想。

爲了把國家提升到超越歷史，它被給予種族的支持。歷史被看成爲種族所散發出來的東西。種族的各種特性被解釋爲與社會條件的改變無關。國家社會主義在排斥以“經濟思想”爲基礎的時候，就下降到一個更低階段：拋棄了經濟唯物主義而向動物學唯物主義求助。

在政治的平面上，種族主義是沙文主義與顛相學結盟的誇大、乏味的形式。像破落的貴族在它的血統的高貴出身中尋求安慰一樣，貧窮化的小資產階級則沉醉於它的種族特別優越這個神話中。個人和階級、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邪惡的，國家則是善良的。但是這個哲學在私有財產的門口被翻過來了。要得到解救，只有靠個人的私有財產。國家財產的觀念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物。把國家奉爲神明，小資產階級份子就是不要讓它擁有任何東西，相反地，他期望國家使他有財有勢，不會受到工人或法警的干擾……。

法西斯主義已經爲政治打開社會深層。今天，不但在農民家中，而且在城市的摩天大廈中，二十世紀與十世紀或十三世紀並存。一億人民使用電，而且仍然相信符號和驅除邪魔的魔術力量。羅馬教皇在無線電上播放水變成酒的奇蹟。〈10〉電影明星去見靈媒。飛行員們駕駛人類天才所創造的奇蹟般的機器，在他們的羊毛套衫上掛上護身符。他們所持有的黑暗、無知和野蠻的儲量是多麼無窮無盡！絕望已經使他們站出來，法西斯主義已經給他們一面旗幟。早就應該被人在社會正常發展過程中從國家有機體中以文化排泄物的形式排除出去的各種事物，現在已從喉中湧出；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嘔吐出未消化的野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生理機能就是這樣的。〈11〉

法西斯主義、小資產階級和大企業

可是，法西斯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的自主性，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些障礙是與晚期獨佔資本主義中的實際社會力量關係相應的。一個有很多行政人員領薪金、更多打手領錢的巨大群眾運動，需要很多錢。〈12〉這樣繼續流進金錢的唯一來源是大企業。但是只有各種情況非常特別的結合，才能使資本家相信，用大量金錢來資助法西斯政黨的價值。〈13〉滿足這些情況的時機是：經濟危機加深；大企業迫切需要摒棄資產階

級民主的主要因素；客觀情勢需要政治權力的較大集中，以實現幾個緊迫的經濟目標；以及至少一個正在等待的獨裁者有充分的公眾支持。

從資本家階級的長期利益、資產階級社會的相對穩定的觀點來看，資產階級議會政制比任何形式的獨裁制度可取，法西斯獨裁制更不必說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建基在鎮壓機制和融合機制的特殊結合上。在鎮壓元素佔主宰地位的地方，就會有較大、較長期的社會不穩定的危險。法西斯主義和其他極端形式的資產階級獨裁制，都是一個不斷的圍困狀態，不斷的內戰形式（可是一個特別的內戰形式，因爲一個陣營被解除武裝、完全受到另一個陣營的支配）。〈14〉這些政府形式對資產階級社會更加危險，因爲它們趨向於提高社會緊張狀態，而且在危機的時刻，在階級調和機制不存在的情況下，趨向於將事態推向爆發點。

所有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長時期有這種或那種獨裁政權的國家中。這是歷史事實（沙皇；南斯拉夫的君主制以及以後被佔領時期的法西斯獨裁制；中國蔣介石獨裁；古巴的巴蒂斯塔獨裁；越南的保大、吳廷琰和阮文紹；尼加拉瓜的索慕沙獨裁等等）。

從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觀點來看，客觀矛盾顯現在這樣的事實上：雖然鎮壓性獨裁制的長期社會、政治代價是高而非常危險的，但是，爲了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制所付出的短、中期經濟代價，在某種情況下，也許會變得難以忍受。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中，資產階級民主包括一個發展了的勞工運動（群眾工會），這個勞工運動反過來意味著勞動力這個商品是集體地、不是個別地出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比在工人們處於支離破碎的情況下昂貴些。除了這個較高的價格以外，資本還要付出像社會保障及其他社會費用等額外的開支。所有這些都會減低淨產品中剩餘價值所佔的比例。當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在一次敗仗、一次嚴重經濟危機或者這些因素的結合之後有了不利的變化，致使產品的總價值停滯不前或開始下降的時候，那麼繼續付出以上所說的昂貴價格的物質能力就開始消失。資產階級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試圖丟棄資產階級民主。

因此，僅僅或甚至主要地把法西斯主義看成爲對工人階級較激進部份的恐怖攻擊——主要地看成爲一個反共的獨裁制——是錯誤的。它是十分不同的東西。法西斯主義的意圖，是要破壞整個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包括它的溫和部份，甚至包括它的“黃色”工會。它的一個意圖，是要真正把工人階級弄得支離破碎。爲了實現它的防止勞動力這個商品任何形式的集體出售目標，它不

得不禁止、攻擊、破壞那怕是最基本形式的階級組織。
<15>

雖然法西斯主義的領導人們，憑藉一些反無產階級的恐怖行動“好例子”，也許能夠吸引某些個別資本家們慷慨解囊，這還是不足以開啓走上政權的道路。要達到那個目的，他們不得不作出決定性的思想、政治讓步。

希特勒，像他之前的墨索里尼、他之後的佛朗哥，由於懂得使用策略及有著無止境的犬儒主義，在恰當時刻找到了恰當字眼：“我會把Fuehrer[元首]原則應用到工廠去”。在工廠中，企業家是唯一的元首，他們在工廠中的統治權是無限的。我們將要停止工會、地方政府、政黨及議會的干涉，這種話給各大工廠主聽起來像音樂一樣的悅耳。在這同時，這徹底摧毀了“德國社會主義”的幾乎每一個聲稱，徹底摧毀了小資產階級份子的幾乎全部經濟空間。如果小資產階級“老鬥士們”被這個“新叛賣”激怒之後被引誘去發動第二次革命的話，他們就會被無情地消滅，正像1934年6月30日真正在第三帝國所發生的那樣。大企業向他們歡呼——不顧這樣的事實：每個形式的“憲政國家”在眾目睽睽之下正被犬儒主義地消除，“元首”的純粹個人武斷的意志正變成唯一“法律”。

但是，對於已被他們的法西斯主義領導人們出賣的小資產階級份子而言，這還不是苦難歷程的終點。他們的群眾運動被官僚化了，而且被合併到國家機構中去。當資本的增值條件有了決定性的改進，法西斯主義的破壞性國內動力就被轉變為有同樣破壞性的國際動力。
<16>

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成份現在也得決定性地增加了。這個驅動，因國家破產的威脅，得到了更多的推動力。法西斯主義的冒險政策就從社會領域傳入了財政領域，為軍事力量的增強開闢了道路。這就給通貨膨脹火上添油。所以，歸根究底，除了在國外進行軍事冒險之外，別無他路可走。這整個發展，在政治上，也在經濟上，除了少數在膨脹了的國家機構中任閒職的人員以外，並不增強，只是減弱小資產階級。接下來，就是資本的加速集中化、中心化。

小資產階級在這個時候被大量地無產階級化；以後，因戰爭關係，就被貧窮化了。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出法西斯主義獨裁制的階級性質；那就是，它一點都不符合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階級性質。法西斯主義獨裁制不代表小資產階級的，而代表獨佔資本的歷史利益。

我們在這裏必須再說幾句。對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與法西斯主義的分歧的、災難性的低估，導致1930—

33年的災難性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這個低估，在博爾迪加、費雪、馬斯洛夫以及有時候的齊諾維也夫等人的補充與說明之下，早在墨索里尼奪取政權時，已經在共產國際的官方理論中出現。博爾迪加等人在當時雖然是所謂“左派”，其實在不小的程度上是極左派。<17>博爾迪加小組在意大利共產黨內部支持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派這個事實，並沒有阻止托洛茨基堅持對這個極左偏向作出理論批評。<18>

（未完待續）

注釋：

<1>托洛茨基論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著作是收集在《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一書中。該書由曼德爾作序言，於1971年在紐約出版。也有一套德文文集，兩大卷，書名為《Schriften über Deutschland》（德國問題論文集）1971年在斯圖加特出版。

<2>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中所用的、有時與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這個名詞等同的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們這個名詞（法文為de classe，德文為Deklassierung），是需要更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

<3>這是Max Horkheimer的觀點。

<4>這裏最好的例子是希爾費丁（Rudolf Hilferding）。他到死都拒絕接受法西斯主義獨裁的資本主義性質。

<5>希特勒與斯特拉瑟兄弟之間的衝突，一直到法西斯奪取政權之時，還是緊張的。

<6>對“猶太人的世界陰謀”這個說法情感上不健康的依戀曾被有些大銀行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領導人是猶太人這個事實所滋養。這個神話仍然是一個非理性、有妄想狂傾向的神話：在上述這兩個集團中，猶太人佔極小的少數。

<7>在這裏，小資產階級的概念是太廣闊了，因為它包括很大層份掙工資的白領僱員和公務員。其實，根據接下來的文字，小資產階級是指小業主的階級。

<8>以後的研究證明，希特勒的大多數選民來自各保守黨的傳統基礎，並不來自社民黨或共產黨的基礎。

<9>事實上，希特勒的歷史觀可以被描述為進化了的原始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各“民族之間”的痛苦“鬥爭”中，得勝的是種族上最強的民族。

<10>現在的教皇不但說過魔鬼的確存在，而且還說他見過兩次，一次是以羊的形式，另一次是以女人身出現。

- <11> “甚麼是國家社會主義？”（1933年6月10日），在《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第399-407頁。
- <12> 見 Jochan von Lang 所著的《Die/Partei》（《黨》）1991年漢堡版。
- <13> 關於對希特勒的財政支持，包括外國（例如亨利·福特）的財政支持，見James and Suzanne Pool合著的《Who Financed Hitler?》[《誰曾財政支援希特勒？》]，1978年紐約版。
- <14> Nicos Poulantzas（《法西斯主義與獨裁》，1974年倫敦版，第61-2頁）對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義論提出兩個批評。第一，把法西斯主義定性為一種“內戰”狀態，托洛茨基就應該分擔共產國際的錯誤觀點，因為這個觀點把法西斯主義者看成為對於採取攻擊的“起義”工人階級的一個反應。這個批評明顯地是對托洛茨基立場的歪曲。他把法西斯主義看成為“單方面的內戰”，換言之，資產階級要擊碎明顯地採取守勢的工人階級的一個攻勢。Poulantzas在熱切地與“經濟主義”戰鬥中，卻不了解經濟的強制性，因為在特定情況下，這種強制性會引致這樣的單方面內戰。第二，托洛茨基被認為“機械地”對比了衰落的資產階級依靠法西斯主義的方式與穩定的資產階級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但是事實上，托洛茨基沒有作過關於整個時代的如此總結性的說法。他一再著重大企業轉向法西斯主義的特定時空。
- <15> 希特勒在1933年清除了工會之後而設立的德國勞工陣線（Deutsche Arbeitsfront），不能被視為工會，甚至“黃色”工會也不是。它只是納粹國家機構的一個附屬部份。
- <16> 從資本中來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從1932年的17.4%上升到1938年的26.6%。所有德國公司的總資本從1932年的206億德國馬克上升到1942年的290億德國馬克。
- <17> 齊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演說中，完全低估了法西斯主義，並說這是一個“喜劇”，“經過了幾個月或幾年之後”會“在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中”結束。他認為與改良主義鬥爭是“主要任務”。見Jane Degras的《1919-1943年的共產國際·文件》第一卷中第四次大會的文件。
- <18> 托洛茨基關於意大利的論文已經收集在1990年羅馬出版的《Scritti sull' Italia》[《關於意大利的論文》]一書中。

China struggling with acute issues today

Zhang Kai

Changes in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were made during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10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China in March 2003. Though Jiang Zemin obtained only 92% of votes (with 98 votes against and 122 in abstention), he remains the one i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State, Hu Jintao, obtained 99% of votes (with 4 against and 3 abstentions), but he has yet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in relation to Jiang.

The outgoing Premier, Zhu Rongji, made a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s Work, and gave a balance sheet of his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ith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amounting to 17.2 trillion yuan (US\$1 = 8 yuan), the deficit has also increased from 46 billion yuan to a budgeted 319.8 billion yuan for 2003 (this does not include 568 billion yuan of state bonds issued last year, and 140 billion yuan of state bonds expected to be issued in 2003). Zhu had thus won himself the nickname of "Deficit Premier".

Zhu's Report stated that refor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 the gist of the entire systemic reform. Two levels of governing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will be set up to monitor state owned assets -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and at the local level. A feature article in Hong Kong reported that this would incite a new round of sa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local officials; with the so-called Management Buyout (MBO), most of the stock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ould be sold to the management. Some economists pointed out that this will be the last scramble for state assets.¹

While state owned assets have been squandered under corruption and bureaucratic management, and was valued at 11 trillion yuan in 2001, privately owned financial assets in China was valued at over 12 trillion yuan according to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The Deputy Head of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Qiu Xiaohua, while review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2002, said that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contributed only to one-third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ereas the two-thirds were from non-state sectors.

Zhu's Report said that since 1978, 27 million workers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have stepped down from their position, 90% have gone into retraining service centres, and about 18 million have found a new job. (That means about 9 million are still unemployed.) However, Zhang Zuoji, Head of the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said 7 days later that up to the end of 2002, China had an unemployed rank of 7.7 million, as well as 4.1 million workers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waiting for a new job.² (He himself had some while ago quoted a figure of 7.52 million registered unemployed and 6 million stepped-down workers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up to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2; that would mean a decrease of 1.72 million among the total number of unemployed within three months, yet he at the same time said that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cute.

The official figures had kept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to 4% at the end of 2002. Wang Menghui, Head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reported that from the studies done

by various groups, the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had reached about 8-10%; in addition, 10 million youths come to their labour age every year.³

With the acute situation, workers actions have been frequent. During the March Congress period, it was reported that in the northeast where unemployment was serious, over five hundred textile workers took to the street for consecutive days in Jiamusi City, demanding unemployment subsidy to be raised; the current meager subsidy was a monthly sum of 120 yuan. Workers from the paper and sugar industries joined the protests.⁴ In Xi-an City, several hundred workers from military arms factories protested dismissal, and launched a sit-in on the highway. In Changchun City, 400 winery workers protested that the management did not provide them with heating facilities. In Liaoyang City, over a thousand workers from metal and textile factories protested against wages in arrears. Fang Qinghui, a young worker from Heilongjiang unemployed for five years, broke into the Reuters office in Beijing and held the staff as hostage in order to draw attention to his plight and to China's corruption. These are examples of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crises.

The situation for the peasants is even more acute. Since 1997, peasants' income has been on the decrease. Zhu's Report acknowledged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re in excess of demand, and the prices were falling, which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peasants' income to drop. The state's suppor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as very small. Of the 17.2 trillion yuan which was five years of total investment into social fixed assets, input in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as a mere 400 billion yuan. The situation will certainly become graver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u Shusheng, a professor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said that more important than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as increasing peasants' incom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purchasing power. However, 900 million peasants suffer from a reduction of the net income, and cannot afford consumption.⁵

According to Zeng Yanpei, Head of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the well being for all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s at a low level of well-being. He said, in 2000, per capita GDP was US\$800, equivalent to 6,680 yuan. Official figures was that th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was 6,860 yuan, and the income of peasants was 2,366 yuan. Qiu Xiaohua, Deputy Head of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said that 40% of peasants' income was in goods, and cash income was only 1,800 yuan. With some of it spent on pesticid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only about 1,500 yuan could be used for consumption.⁶

Wang Xuchao, President of the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said that there are still around 30 million people in China's countryside who are below subsistence level, and about 60 million at the subsistence level. There are 14.59 million people in absolute poverty, with an annual income below 500 yuan. There are 90.33 million in poverty, with an annual income below 1,000 yuan. Those with an income between 1,000 and 2,000 yuan are 310.79 million.⁷ They amount to about half of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t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hen Mingde,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State Building Society, said that over half of China's population had an income below 2,000 yuan, and the rich-poor disparity has exceeded the international caution line.⁸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at the burden on peasants had to be alleviated, and had issued decrees to reduce tariffs on peasants. In over 20 provinces, a reform turning fees into taxes has been experimented.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local governments finding ways to bypass decrees of central governments.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bureaucracy are still very much an obstacle to peasants improving their lives. Sun Dawu, Director of Dawu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Group in Hebei Province, pointed out that a peasant intending to legally sell boiled eggs would have to go through over 40 procedures. The compartmentalized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tate departments and the excessive powers held by the local rural power mechanisms made it difficult for peasant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for the countryside to develop.⁹

News of peasants resisting oppression is usually blockaded, but some have found ways to leak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example, the Xinhua Web reported on some incidents: in January, at Nangwang Zhuan, Guche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2,000 villagers refused to submit the agricultural tax and fought with about 30 tax-collectors sent by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Three days later, 6 villagers were arrested, but the villagers held the township party secretary and several people as hostage. In the end, the county government gave in to the villagers. Another incident occurred in Nanjing: over 300 workers coming from the countryside took to the street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not paying them their wages.

The problems facing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China cannot be radically resolved without a democratic political reform which does away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of various levels of the bureaucracy. Such views are being voiced by dissidents in China. In March, the magazine 21st Century Globe Journal was banned, and one of the five charges was that it published an interview with Li Rui who had served as Mao Zedong's secretary. Li said that China's biggest danger is "non separ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party's rule superseding law, and the rule by individuals overriding the rule by law". He also said,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political reform should start from democratisation within the party, and all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should be elected by the 17th Party Congress.¹⁰ Two editors of the News Weekly were dismissed for writing a review of Zhu Rongji's performance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These voices, though occasionally repressed, allow us to see the changing scen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6 April 2003

1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29 March 2003.

2 Wen Hui Bao, 13 March 2003.

3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26 March 2003.

4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13 March 2003.

5 Hong Kong Economic Daily, 13 March 2003.

6 Hong Kong Economic Daily, 15 July 2002.

7 Ming Pao, 23 March 2003.

8 Apple Daily, 13 March 2003.

9 Apple Daily, 5 April 2003.

10 Sing Tao Daily, 15 March 2003.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0卷第1期(總第212期)

2003年5月31日出版

香港

- 2 必須反對23條立法.....本刊評論員
4 港府無能差勁 沙士變本加厲.....振言
5 港府不應大削綜援，向貧弱開刀！.....微波

中國

- 6 疫情強烈肆虐 當局負有咎責.....軍行
7 政府報告啟示的當前嚴重問題.....張開

反對美帝 攻伊特輯

- 11 強烈反對美軍攻佔伊拉克.....社論
12 新帝國與戰爭.....羅莫、米勒
12 21世紀的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瑟法蒂
14 給戰爭火上添油.....尤德里
16 帝國在投下三連贏賭注嗎？.....《逆流前進》
18 九一一事變以來的國際局勢.....黃申摘譯
21 九一一週年後美國工人仍感到餘波.....庫塔力克

國際

- 23 菲律賓反對軍事全球化.....塔班班瓦
24 走向第三屆世界社會論壇.....曼庫諾
25 巴西：人民的勝利.....社會主義民主派
27 巴西工人黨與2002年全國大選.....社會主義民主派

特譯

- 30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九).....曼德爾

英譯

- 34 China struggling with acute issues today.....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0 ISSUE 1 2003.5.31

HONG KONG

- 2 Oppose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4 SARS worsens due to government impotence.....Zhen Yan
5 Do not cut social welfare for the poor!.....Wei Bo

CHINA

- 6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blamed for spread of SARS.....Jun Xing
7 China struggling with acute issues today.....Zhang Kai

SPECIAL ON US INVASION OF IRAQ

- 11 Against the US military invasion of Iraq!.....October Review Editorial
12 The new American Empire and war.....B.Romo, J.Miller
12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C.Serfati
14 Oiling the war machine.....C-A.Udry
16 The Imperial Trifecta?.....Against the Current Editorial

- 18 The world situation after September 11.....(tr) Huang Shen
21 September 11: one year later.....C.Kutalik

INTERNATIONAL

- 23 Philippines: fighting military globalization.....H.Tubongbanwa
24 Towards the 3rd World Social Forum.....E.Mancuno
25 Brazil: A popular victory.....Socialist Democracy Current
27 Brazil: The PT and 2002 elections.....Socialist Democracy Current

SPECIAL ARTICLE

- 30 Trotsky as alternative (9).....E.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34 China struggling with acute issues today.....Zhang Kai